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農藝復興：臺灣農業新浪潮

Agricultural Renaissance in Taiwan

doi:10.6752/JCS.201603_(22).0003

文化研究, (22),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2), 2016

作者/Author：蔡晏霖(Yen-Ling Tsai)

頁數/Page：23-7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03](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gricultural Renaissance in Taiwan

Yen-ling Tsai

農藝復興：臺灣農業新浪潮

蔡晏霖

本文各階段初稿曾發表於2012年臺灣社會學年會、中研院民族所、東華族文所，感謝在場聽眾們的指正。歷時甚長的寫作期間裡，感謝本專題主編李丁讚一路砥勵，與審查人惠予建議。感謝友善小農社群成員，尤其陳榮昌、李寶蓮、賴青松、楊文全、吳紹文，與土拉客成員們的長期對話。陳彥仲、劉亮佑、葉于甄、郭沛軒協助研究，宜蘭縣史館提供寫作空間，科技部支持經費(MOST103-2410-H009-050-MY2)，在此同申謝忱。

蔡晏霖，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電子信箱：nikar2009@gmail.com

airiti

摘要

臺灣當代新農浪潮同時反抗也受惠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也與歐美日的另類食農網絡運動及其生態優位的普世性論述對話。這篇論文以宜蘭友善耕作社群為關懷場域，指出此波新農浪潮的關鍵在於「農」在意義與功能上的整體性復興，也就是農義復興。而農意識的多元化來自異質行動者的多方轉譯，本文稱為農譯。具體而言，在消費端，藝文工作者使農進入城市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在生產端，友善小農以跨物種協力生產的在地農法，使稻農與福壽螺的關係從對立轉為共生。農義復興於是有賴農文藝與農技藝工作者的多重農譯實作。在此過程中，農與非農、人與非人行動者形成既鬆散又連結的新農江湖，集體但不同調地拓展農在當代臺灣的時空性質、社會認同與經濟可能，並從中持續摸索突破當代生態與社會困境的多重路徑。

關鍵詞：友善耕作、新興食農網絡、多物種民族誌、鄉城關係、宜蘭

Abstract

Based on fieldwork among a community of sustainable smallholder farmers self-identified as “friendly farmers”,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promises and paradoxes of a new politics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in Taiwan. I argue that this politics is first and foremost about the articulation of a new rationality of agriculture, which emphasizes not only the economic value of agriculture, but also its multiple functions in fostering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community livelihood, local food sovereignty, and regional biodiversity. No less impressive is the fact that humans and non-huma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ave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articulations of this new rationality. On the consumer end, for example, artists and writers help to re-situate agriculture in urban settings, bringing farmers’ life worlds from field to table. On the production side, friendly farmers work against the green revolution legacy by choosing not to poison and exterminate the invasive golden apple snails. Instead, they hand pick snails and learn to transfor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ce farmers and snails from one of opposition to that of collabor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open-ended assemblage that these farmers and non-farmers, human and non-human actants create, has collectively expanded the social horizon,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economic viabilities of agricultur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Keywords: Friendly farming, 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 Multispecies ethnography, Rural-urban dynamics, Agriculture in Taiwan

airiti

一、序言

(一) 翻轉的十年

2012年9月，一封信點燃了秋天。臺南農民楊宇帆在個人部落格貼文，批評農委會的「保障返鄉務農青年基本工資兩年」政策。¹透過網路轉貼，楊文一天吸引五萬讀者，並引發媒體廣泛報導。親友與陌路紛紛上門，要和楊宇帆聊願景、談合作，甚至介紹女友。²媒體跟風多少模糊焦點，然而楊的論點始終一針見血。他質疑，政府「憑什麼決定我們回鄉務農就是要領最低薪資？」他更主張，與其乞憐於救殘式的補貼，農人需要的是健全的產業環境：國家若能以積極作為保障農業生產條件，並從需求面擴大本土農產市場，農人的收入自然提高，又何需治標不治本的補貼？值得注意的是，楊宇帆透過網路平台發表意見，既不對主管機關陳情也不投書媒體。他跳脫農人與國家互動的既有位階，在信中直呼總統「親愛的英九」，並以「一個朋友的立場」反諷農委會主委與專家政治。楊的產銷實踐也逸出政策規畫：他拒絕農委會擴大生產規模的建議，堅持友善環境的小規模自產自銷模式；而在為文呼籲政府重視食農教育前，他已將第一季收成回饋在地小學。楊宇帆是新農人，也是新一代的農村行動者。

這篇論文聚焦於如楊宇帆般的新農，以及他們與老農、「文青」雜誌、福壽螺、高速公路……等人類與非人行動者共同形塑的臺灣當代新農浪潮。猶記得《無米樂》(2004)紀錄片尾，老農崑濱伯在「末代滅農」的嘆息中喃喃祭天，也彷彿為2002年前正面臨世界貿易組織(WTO)入會挑戰的臺灣農業告輓送終。相較於彼時崑濱伯豁達中帶著無奈的「末代滅農」形象，2012年的楊宇帆們卻要求政府「多花點時間去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因為「我們還年輕，可以等。」(2012)從崑濱伯到楊宇帆，從「末代滅農」到「崩世代熱血務農青年」³，十年來食農議題在臺灣社會愈受重視，農人與農業在公共論述裡的位置與形象，也有了從悲情迎向希望的翻轉：青年從農人數增加、

-
- 1 此政策的正式名稱為「新農人返鄉計畫」，是透過各地農會與農業改良場篩選符合資格的年輕人，在一定範圍內種植具有競爭力的雜糧作物，最後再以農糧署的農家賺款為基礎統計收入，不足最低薪資者再補以差額。
 - 2 楊文的後續效應，可參見〈鳳梨農向總統建言，盼健全農業環境〉（呂宗芬、許政俊 2012）。
 - 3 「崩世代熱血務農青年」語出〈不當休耕補貼，讓熱血務農青年成為崩世代憤青！〉（汪文豪 2012）。

趨勢雜誌鼓吹「務農就是一門好生意」，而揭露國土過度開發問題的紀錄片《看見臺灣》(2013)，更以兩位生態耕作小農作為重建人地關係的解方。⁴從柏林國際設計節到香港「臺灣月」，不同的設計團隊都以新農為主角行銷臺灣，大談「青年回鄉墾植、務農人回歸自然耕種、小農集合自創市集，是臺灣新價值」。⁵種種境外形象輸出代表這股新農浪潮有其跨國脈絡。若以近年聯合國與世界博覽會主題為指標觀察——2014、2015、2016聯合國與2015世界博覽會的主題分別是「家庭農業」、「土壤」、「豆類」，以及「餵養地球」—農食議題確實穩據目前全球議事核心。⁶

除了農人的社會形象翻轉、農業相關議題廣受矚目，「農」的空間性也有了變化。在歷經半世紀快速離農的都市化進程後，臺灣從北到南的都會區都正面臨著「農的重返」，見證「農」以各種創新形式現身都會空間：臺北市府投入田園城市計畫，推動市區種菜與校園食農課程。建設公司推出配備種菜廚房的高級建案，並在市中心打造以「城市梯田」為主題的公共藝術。⁷強調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互動的農民市集進駐市區街巷與百貨商場，市集總數於八年間從零到破百、營運資金來源從民間自籌到廣獲公部門支持。⁸來自食品業大廠的評估更指出，臺灣有機農產品市場有15-20%的年成長空間。⁹

4 2012年7月-2013年6月的統計資料指出，2008年起臺灣經常性以農為業的家戶增加了一成，北部地區增幅更達54%(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這個數字尚不包括不具農民身分的實質務農者，包括本文中多數的友善小農。相關趨勢報導，可參考遠見編(2014)、商業周刊編(2015a)，以及陳玉華、洪依婷(2016)。

5 參見綠雜誌編輯室(2012)、光華新聞文化中心(2012)。

6 更具指標性的是聯合國國際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於2014年9月召開「生態農業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groecology)，首度採用agroecology這個國際農運界長期主張以此取代工業型農業的概念。

7 「城市梯田」是楊儒門、248市集與立偕建設於2013年合作進行的行動藝術展覽內容之一，展覽的總名稱為「種子計畫」，由立偕建設租下信義計畫區內閒置地，搭建樣品屋式展覽空間，並於建物外進行以人與水牛為主力的菜稻耕作，同時舉辦系列農事體驗活動與講座。

8 2006年，高雄旗美與臺南社大各自舉辦了一次農民市集。2007年5月，臺灣第一個常態經營的農民市集——合樸農學市集於臺中首辦。2010年全臺農民市集成長為15個，2011年約25個，2013年中計約65個，2015年初累計數字破百，常態定期性舉辦的約有40幾個。歷年市集的統計數字，請參見《第一屆與臺灣農學市集研討會文集》(2010)，陳啟怡(2011)，〈臺灣農夫市集地圖〉(2013)，蔡佳珊(2015)，也感謝許益豪提供2015年初的資料。公部門補助農民市集始於地方政府，農委會從2011年起也補助新設市集。宜蘭縣政府則首開公部門主辦農民市集的先例。

9 參見永豐餘生技公司代表張瑾文(2015)演講。

換言之，新農浪潮涉及的不只是「農」由鄉進城的空間位移，還涉及「農」在主流價值體系中由廉價到好價、由落伍到優質、由瀕臨淘汰到前瞻未來的象徵秩序位移：無論是以健康自然、生態永續、或以無污染低耗能的形象出現，這些當代新農實踐往往構連著「品質」、「誠信」、「樸實」、「利他」等倫理性形象。正是在「農」的價值如許上升的脈絡下，一反過往如流行歌曲《孤女的願望》(1960)中農村青少年離鄉進城、打工找未來的無奈宿命，如今是都市青壯年藉由農場打工、甚至棄業歸農而踏上自我追尋之路。然而與此同時，臺灣農業勞動力持續不足、整體政策方向依然輕農重工、土徵爭議與食安風暴不斷，都市游資湧入農鄉炒地，實行四十餘年的水稻保價收購制度變更在即，愈來愈多外國農產與加工品正透過自由貿易協定搶占本地市場。¹⁰這似乎是一個最好也是最壞的關鍵年代，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從生產資源、消費模式、政策走向，到社會參與，臺灣農業的一切都在變化。

(二) 農與藝

該如何把握這股既全球又在地的浪潮，並解析其中人口回流、價值轉向、認同重建的當代意義與矛盾？本文以長期的田野研究為基礎，從新農聚集地之一的宜蘭出發，目的不在於窮盡臺灣新農浪潮所有面向，而是嘗試突顯我以「農藝復興」概稱的關鍵型構。換言之，「農藝復興」並非企圖描述或解釋一切的框架，而是一個有助於析辨現象的發想工具(heuristic device)¹¹——它將「農」與「藝」放在一起思考，藉其衍生的相關意義擴大並組織我們對於當代新農浪潮的理解。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曾指出，現代英語中的art有著豐富且內在張力十足的意涵：art最早是指與「自然」對比的「人為」技能，包括史學、詩學、音樂、戲劇、舞蹈、邏輯、修辭、幾何、數學、天象等種種智能(the liberal arts)，以及在文藝復興

10 《商業週刊》2015年4月的調查報告指出，2012-2014年間全臺地價平均跌幅為11.4%，鄉鎮地區平均漲幅卻達四倍，可見都會游資已湧進農鄉，可參見商業周刊編(2015b)。關於「買臺灣農地、兩岸融資」相關報導，可參見約翰之聲(2014)。在政策改變上，農委會與雲林、高雄、屏東、宜蘭、新北市等地方政府自2006年起先後推動青年歸農（不再只鼓勵農二代回農）；農委會自2008年起推動休耕轉作、自2013年起減少休耕補助規模、補助本土雜糧與有機種植；新北市自2013年起於營養午餐供應有機蔬菜；宜蘭縣政府自2013年起於公有地禁用除草劑、2014年起補助農會收購福壽螺以鼓勵田間農藥減量（臺中市於2015年跟進）、委託宜蘭社區大學辦理綠色工作研習課程「夢想新農」蔬菜班與水稻班、2015年推出「宜蘭嚴選」計畫，鼓勵減農藥耕作並透過農業處的檢驗與媒合來確保銷售。

11 heuristic device的用法參見Choy(2011)。

時期才被提升為art的繪畫與雕塑。換言之，art原本包括了美藝(fine art)、工藝(craft)、技術(technology)、科學(science)等今日看來高度分殊的人類技能。18世紀以降，許多原本屬於art的技能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專殊化且商品化，art也逐漸轉而指涉「在動機與形式上比較不具有立即交換價值」的技能，從而將匠人、技師、科學家都劃出了artist的範疇。威廉斯認為，19世紀以後的art排除自身原有的實用性與工具性，轉而尊崇想像力、創造力、非功利主義與普世性的人文關懷，藉此對日趨主流的工業化生產模式提出批判。當代語境中「美藝」(fine art)與科學、技術、技藝等「實用藝術」(useful arts)的區別也由此而生。只是當商品化的藝術市場逐漸興起，實用與美藝的區別又再度趨向模糊(Williams 1983: 40-42)。

「art / 藝」的多義性及其與「農」結合後所衍生的多層次「農藝復興」，為本文提供一個關切當代新農浪潮的視角。¹²首先，新農浪潮中一個能見度極高的趨勢，是音樂、修辭、美術、影像、舞蹈等藝文(fine arts)工作者對「農」的積極跨界詮釋，包括由公、私部門資金挹注的農產包裝、行銷企畫、品牌形象設計等意在提升農產品立即交換價值的農創產業，也包括諸多結合農業、生態、社區、都更議題並帶有高度社會批判意識的「社會性藝術」。¹³而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提示了藝文 / 美學勞動在農業生產部門與大眾消費市場之間日益顯著的中介性力量。可以說，當代新農實踐一方面追求傳統產銷中介層級的減少(最好由生產者直接賣給消費者)，一方面則見證了另一種「文化中介」勢力的崛起。

再者，當代新農浪潮亦見證著不同農耕典範的併陳與競逐。源自歐美的化學與工業型農業(industrial farming)耕作範式，在二戰後以「綠色革命」與現代化之名主導全球農業發展，近年更積極推動基因改造作物與植物工廠等能源、技術，與資本更加密集的單一種植模式。與此同時，諸多源頭與操作方法各異的生態型農法實踐則在全球南北蓬勃發展，從適地適種、多元混種、資材循環、低碳投入、適切科技等多重角度提出工業型農業的替代方案。同樣地，無論是生態型或工業型農耕模式，都強調過程中相關在地或科技知識的高密度投入。也因

12 就我所知臺灣最早開始談「農藝復興」的是郭志榮(2003)。

13 包括(但不限於)蕭紫菡的「土地計劃」舞作系列，生祥樂隊、好客樂隊、吳志寧、黃瑋傑、農村武裝青年等以農為主題的音樂創作，鄭安齊、池依林、野上野下、料理最前線等個人或團體在土地正義運動現場精彩的運動 / 創作，以及由林欣琦、蟻又丹組成的田文社在宜蘭員山新農社群中的紀錄、設計、與工藝創作。臺港「社會性藝術」相關案例與比較性論述，參見吳瑪俐(2015)。

此，有別於綠色革命造成部分農民過度仰賴化肥、農藥，與標準化操作的「去技術化」現象，當代新農浪潮表現出對農的工具性技藝(useful arts)的高度重視。

然而本文認為，新農浪潮不只是藝文行銷與另類商機，工業型與生態型農業之間的典範爭議也不僅止於技術差異，而是關乎「農」在人類生活中的整體定位。廣義的農，始終是人如何向自然討生計的多物種實踐性關係，究其本質是將人與自然牽連起來的「物質——符號叢結」(material-semiotic knot, Haraway 1997)。在工業資本主義現代性下，農業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愈形斷裂，農的社會意義也被窄化為只與特定人群（農民）、空間（農村）與產業（農業）相關，再因其低市場產值而被視為不具競爭力的落後存在，甚或直接被定性為三農「問題」。反觀今日，「農」在生產優質食物、維護國民健康、保育環境水文、發展永續觀光、活絡社群經濟、傳承並創新文化、維繫在地主權，甚至重建人際與家庭互動的多元功能漸獲重視，許多論者更將生態型農耕及其「重建人與萬物共生關係」的倫理性願景視為解決當代生態與社會危機的出路。本文認為，這代表「農」正逐漸從20世紀工業現代性下的邊緣存在，上升為關乎一個社會的整體生活型態與發展策略、甚至攸關人類與地球其他物種未來的全方位議題。這是「農」在21世紀的整體復興，也是本文所稱（廣義）的「農藝復興」(agricultural renaissance)。此一農意識的多元與多工發展，正呼應威廉斯所言「art / 藝」初始超越美藝與技藝、工具與非工具性、整體與分殊等二元疆界的全面性意涵。

本文將於第三節依序探討21世紀農藝復興的三個面相——這並非截然分立的三個層次，而是從三個切近點觀察一個連續性的動態。我先從「農藝」復興開始，以「友善耕作」為例具體討論農的當代意涵與功能如何由單一變趨多元。接下來我開始考察農意識的生產動態。農意識的多元化不會因為政策推廣就上行下效，也不單只是網路社會與社群媒體的附屬效應；本文開頭例舉的楊宇凡，也是因為他突破既定農民框架的話語與行為，賦予「返鄉新農」甚至「農民」有別於以往、強力而有趣的新意，才引發社群乃至主流媒體的廣泛關注。換言之，當代農意識的拓展，取決於誰、在何時、何地、對誰、以什麼方法，使原本與農無關的人事物變得相關，或者賦予原本相關的人事物新的意涵與價值，從而使農與非農部門之間產生更多而豐富的連結。獲益於女性主義人類學與後殖民文學批評理論，本文將這些多元意義的生產與闡連 (articulation) 視為一種廣義的「翻譯」實作，其中包括在臺灣本土與外來農意識之間的跨語際 (translingual) 翻譯、在新舊農意識之間的跨文化

(transcultural) 翻譯，以及在意識與實踐之間的跨知識類型 (transmodal) 翻譯。¹⁴ 尤其重要的是，翻譯從來不只是單純的引介，還涉及意義的轉化與創造 (trans-creation, 張君玫 2012)。也因此，觀察新農浪潮中蓬勃的「農譯」實作能引領我們看見農與非農部門之間既定界線的協商，也由此認識當代農義擴張背後的多方異質行動者。「農義」復興，實有賴多元而活潑的「農譯」復興。

農藝復興的第三個切近點深入兩個以「農藝」進行「農譯」的案例，在此可稱為狹義的「農藝」復興。我先以老牌農業雜誌《鄉村小路》的轉型為例，探討藝文產業如何開拓農在當代臺灣的社會空間。其次，我透過對新農社群的參與觀察，探究新農行動者如何藉由生態型農技藝的提升以實踐農的多元價值。本文主張，正是透過（但不限於）上游的「農（技）藝」復興，與下游的「農（文）藝」復興——21世紀的「農」才得以掙脫狹義的空間（農村）、人群（農民），與產業（農業）三農框架，一方面在生產端重拾農與自然生態的連結，一方面在消費端發展出農與社會人群更寬廣的連帶。「農」的當代意涵與實踐也由此豁然開展：從農村進入城市、從農民跳過傳統產銷體系而直達消費者（如農產直販、社群協力農業、農民市集、網購平台），更從初級農產品衍生相對高附加價值的加工、服務、美學，與知識經濟（如小農食材料理、農產禮品、農事體驗、農創商品、農食教育、農村旅行等）。21世紀的農藝復興，來自「農義 / 農譯 / 農藝」之間相互生成、三位一體的動態關係。

（三）兩個田野

本研究的主要田野地點在宜蘭，而且選擇性地聚焦於員山鄉的「友善耕作小農」社群。這是因為，作為臺灣少有的本土新農論述，「友善耕作」從宜蘭發端到廣為臺灣社會接受的過程，適足以說明臺灣新農浪潮中「農義 / 農譯 / 農藝」三位一體、相互生成的綿密動態。我於2010年初加入宜蘭友善小農市集的經營團隊，參與小農社群的組織工作。2013年起投入經營「土拉客實踐農家園」，和朋友共同承擔1.5公頃水稻田與0.3公頃砂質地菜園從生產到銷售

14 「翻譯」是一個高度紛雜的跨學科概念。在此我引用人類學者Cris Shore(2005)以歐盟憲法為例的討論，他建議以至少四種理念型分類來精練學界對於「文化翻譯」的理解：首先是字詞與字詞之間找或找不到對等意義的「跨語際翻譯」(translingual)；其次是當思想與概念穿越不同經驗世界被理解的「跨文化翻譯」(transcultural)；第三是從理念到行動的「跨知識類型翻譯」(transmodal)，第四則是考量翻譯的「制度性實作」(translation as institutional practice)，包括翻譯的位置與政治。

的營運事務；個人的工作重心也由產消鏈結的串連服務，逐漸轉向第一線的生產工作與在地議題倡議¹⁵。可以說，過去六年來我見證宜蘭新農實踐的主舞臺由消費端往生產的位移，也讓這個發展脈絡牽動自己的生命軌跡。宜蘭友善新農社群之於我因此不只是學術的田野，更是生活與生命的田野。本文多數觀點都是在此雙重田野中、從我與許多新農行動者的共同勞動與長期對話中萌芽。

本文敘事也因此儘量遵循時序，以求忠於行動者當時的觀察與脈絡發展。我將在第二節先介紹不同時代的重農主義與返土浪潮，比較性地釐清臺灣當代新農浪潮的時代意義與特性，之後再介紹宜蘭的友善耕作小農社群。第三節開始依序論述「農義」、「農譯」、「農藝」復興的多層次意涵與交互形塑關係，再於第四節進行綜合性的討論。本文最終想指出的是：新農浪潮並非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運動或趨勢，而更像是一個物種、論述、技術、與夢想混合交織、相互作用的異類聚合體，其中充滿殊異、甚或相互矛盾的利益與計畫——簡言之，一個同床異夢、甚至各懷鬼胎的「江湖」。¹⁶透過各種有意圖與無意圖的農譯實踐，新農浪潮中的農與非農、人與非人行動者形成一個動態的網絡，讓新的連結與想法不斷從中發生，從而集體但不同調地發展出回應當代生態與社會困境的多重路徑。這些努力對於農業產值的貢獻或許依然有限，但已經大幅深化臺灣社會對「農」整體價值的認識與討論。

二、新農浪潮：過去與現在

（一）新農浪潮並不新

本文以「新農浪潮」統稱各種倡議農務價值的重農主義（agrarianism）思潮與實踐，它們在不同時地具有不同的性質與面貌。在具清教徒工匠

15 近兩年我獨立負責的水田面積約占土拉客整體耕作面積的十分之一，分別是2015年的1分蓮藕田加1分水稻田（共約600坪），與2016年的1.6分（約500坪）水稻田。我同時參與家庭農場中的家務勞動、包裝出貨、行銷宣傳、財務週轉、理念論述等工作。

16 「異類聚合體」的想法最早來自黃慧瑜的藝企合作研究。「江湖」則來自《江湖在哪裡？》（吳音寧 2007），臺灣當代新農浪潮的關鍵農譯作品之一。新農浪潮中最突出的異業合作關係首推小農與大建商的合作，包括大屯溪自然農法教育農莊與士新建設合作的社區農園建案，見〈「士新·漂鳥」農莊實現樂活夢想〉（李坤建 2007），以及臺北248市集與太平洋建設的長期合作。

傳統同時也是工業資本主義實驗前線的美國，19世紀中葉起陸續出版 *Ten Acres Enough* (Edward Morris 1864)、*Five Acres Too Much* (Robert Roosevelt 1869)、*Three Acres and Liberty* (Bolton Hall 1907) 等返土運動(back-to-the-land movement) 經典著作，而且每逢經濟不景氣就熱銷。¹⁷19、20世紀之交的歐洲、南非與日本，則在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與魯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的影響下興起具社會主義性格的農場公社或新村運動。¹⁸1930年代，梁漱溟在半殖民情境下的中國提出以農為本的新文化與新社會建設藍圖，尋思一條有別於歐美的另類現代性道路(艾愷 2013)。儘管左右、東西立場殊異，以上返土實踐大抵都在尋求資本主義工業現代性之下的另翼生活(alternative living)可能。

重農返土運動的另一個關鍵脈絡來自對工業型農業的反省。工業型農業是以合成化學肥料、農藥、雜交品種與機械耕作為核心要素，其操作模式易衍生地力耗損與生產過剩等問題。1930-40年間，隨著合成化學肥料的逐漸普及，德、英、美、日陸續出現生機互動(biodynamic)、自然農法，以及對亞洲傳統循環利用型農業的研究，主要就是在回應地力耗損的問題。¹⁹它們反思工業型農業「缺什麼補什麼」的化約論觀點，主張以生物性、可循環性的農業資材取代化學性資材，並重視土壤及其他生長條件之間的整體性關係。²⁰1960-70年代，這些另翼農法(alternative farming)實踐進一步與歐、美、日青年的抗衡文化、健康食物運動、環境主義匯流，在全球北方促成「返土歸農」風潮，以及「在地消費」、「共同購買」等消費者運動的萌芽。

17 Gould(2005)、Brown(2011)、周序樺(2013)。

18 包括瑞士的Ascona(1900-1920s)、英國的Whiteway(1897-1930s)、Millthorpe(1890-)、由甘地在南非創辦的Phoenix與Tolstoy Farm(1910s)、1910年間由武者小路實篤等理想主義者於日本發起的新村運動(Atarashiki Mura)，以及稍晚在英國出現的Ditchling Common(1913-)與Adelphi Center (1935-，Karl Polanyi曾來此講學)(Green 2000)。新村運動對於中國理想主義者的影響，見趙泓(2014)。

19 本文限於篇幅無法處理的是19世紀浪漫主義對於回農風潮的影響。除了對工業現代性提出反思，19世紀的德國也視農民與鄉村為國族文化底蘊，並以風土的特殊性想像對抗拿破崙以降的法國普世性啓蒙論述。由此脈絡來看，早於1924年即對化學農業提出批判的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 1861-1925)也同時是位備受肯定的歌德思想研究者，絕非偶然之事。

20 相較於這些源於北方國家的另翼農法實踐，源於泰國的KKF農法強調的是種子而非土壤的優先性，這或許凸顯了溫帶與熱帶農業的差別：溫帶生態循環系統的生質養分(biomass)累積於土壤，熱帶生態循環系統則累積於植株本身。

然而也是在1970年代，美國農業基本法多次修正，藉由生產與出口補貼將工業型農業的生產過剩問題外部化。這些政策促成1980年代跨國農企業(agribusiness)的崛起：他們一方面藉由補貼形成的規模經濟優勢擠壓國內小農生存空間，一方面透過自由貿易協議對外傾銷而擠壓南方小農生存空間。跨國農企也同時受益於北方國家產業外移造成的勞動條件與購買力下降，迫使受薪階級只能消費低價的工業化食品。及至歐美日陸續爆發狂牛病等大規模食安危機，新一波的食農運動於是再起，並比以往更強調結合生產端與消費端的力量以共同對抗大型、遠距、壟斷型的工業化農食體系：源於義大利的慢食運動，鼓勵消費者從速食轉而追求在地風味與食材。發端於英國的消費合作社運動，鼓勵消費者以共同購買抵制連鎖超商的壟斷。日本的「提攜運動」（全球化後成為更廣為人知的「社群協力農業」），以及於美國快速發展的「農民市集」運動，則強調直接向農夫購買以支持在地生產者。這些可統稱為「另類農食網絡」（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s，以下簡稱AAFNs）運動的相關實踐反對工業化農業求量求快、求利求便的思維，轉而強調少量多樣、以環境與社群為念的短鏈消費模式。除了鼓勵生態型農耕，AAFNs 往往也重視公平交易、社區照護、糧食主權、農場工人勞動權等多元價值，期望藉此重建當代生活世界的生態與社會多樣性。²¹儘管時代背景各異、面貌多元，新農浪潮與工業資本主義的危機密切相關，並從對工業現代性與工業型農業的雙重反思汲取能量。

（二）臺灣的返土之路

然而必須指出，一批批歐美青年返土歸農的1960年代，卻也正是（包括臺灣在內）無數第三世界青年離土離農的年代。我們因此必須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下回顧臺灣的依附型發展以及農在其中的位置，才能更完整地理解臺灣新農浪潮的在地意涵。²²二戰後，美援與工業型農業成為美國軍事工業複合體

21 關於AAFNs的回顧與論辯性文獻，請參考Goodman(2004)、Alkon & Agyeman (2011)。AAFNs在全球南方依然缺乏政策性與社會的支持（Abrahams 2007），而即便在全球北方，AAFNs的成果亦不均等地為白人與中產階級以上的社群所享(Allen 2008, Guthman 2004, 2011)。此外，北美的AAFNs強調消費端的力量，相關實踐多聚焦於重建產消之間的社會連帶；歐洲各國則強調對生產端的政策性支持，相關實踐聚焦於農鄉社會的整合性再興(Dupuis and Goodman 2005)，其中法、英政策又有重農與重鄉之別(Lowe and Ward 2002)。

22 例如：延續太平洋戰爭時日本為提高戰時食物自給而推動學子種菜，二戰後臺大學生亦組織「耕耘社」在校園種菜，多人因此獲罪，甚至繫獄長達十年（國立臺灣大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全球擴張的關鍵性環節。²³國民政府先於1950年代以維穩型的土地改革奠定臺灣以家庭農場為主要生產規模的「小農體制」，繼之大力推廣「綠色革命」及其所需的化肥、農藥、機械、技術，與美式飲食。1960年代歐美製造業陸續由母國出走，開始在世界不同地區反覆上演吸納生產資源與廉價勞動力→留置污染→開發消費市場→工資上漲→再度外移的資本擴張劇碼。相應地，臺灣也從擴大農業生產轉而進入以「出口帶動成長」的東亞發展模式，此後並不斷犧牲農業部門以換取在前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代工位置。²⁴正是基於對依附型發展及其工農關係的反省，一群思想上承襲70年代鄉土文學「回歸現實」精神、實踐上汲取80年代社運經驗的青年，從80年代末期起投身鹿港反杜邦與美濃反水庫運動（杜邦與水庫都是歐美的工業輸出），後續再藉由90年代社造運動提供的論述與物質資源在農村立足紮根。在農工部門流動頻繁、農鄉價值卻長期受貶抑的臺灣，城鄉間的精神距離比物理距離更難跨越，回鄉青年必須承受向上流動失敗的污名。²⁵「返鄉」因此不只關乎工業現代性的去異化工程，也與去殖民過程中深層的文化抵抗與主體再造相關。是在這層意義上，80年代的「愛鄉返土」運動，尤其其中宏觀性地整合環保、農民生計、新住民、空間規畫、成人教育、文化保存與創作等議題並據此提出的另翼農鄉發展視野，對後繼返鄉者影響深遠。²⁶

當代新農運動另一股重要的實踐脈絡是「安全飲食」與「在地消費」。

學校史館 2011)。這個以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為目標的校園種菜史，與當前臺灣校園流行的「可食地景」形式相同，但意義大相逕庭。感謝陳彥仲提供相關資料。

- 23 Friedmann(1993)主張，冷戰時期(1945-1973)美國透過美援主導戰後國際農糧交易秩序，是她所稱「國際農糧體制」歷史發展的第二成熟階段。Araghi(2003)則主張，由於冷戰期間南北國家的管制力均遠勝資本的力量，此時期應該被視為殖民資本擴張過程的重要變形與特例，因此是「反國際農糧體制」(anti-food regime)。
- 24 例如1978年為中美貿易談判而開放雜糧進口、1993年起推動農業結構全面市場化轉型，包括稻田休耕轉作；2001年又為加入WTO而開放國外食品進口。兩岸貨貿協定則預計開放中國食品加工品進口。主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的美國也以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美豬進口作為臺灣參與TPP談判的入場卷。
- 25 遲至2003年，主流媒體依然責怪返鄉種田的「失業青年」造成農產品量大增與價格崩盤，參見〈夏季蔬果價跌，農民苦〉（陳界良 2003），〈農產品價廉，傑出農民吐苦水〉（陳正喜 2003）。2005年起，媒體開始出現關於「返鄉青年」的正面報導，參見〈返鄉創業陳保成榮獲神農獎〉（張柏東 2005）。關於70年代的鄉土運動世代，見蕭阿勤(2005)。
- 26 見美濃愛鄉協進會(1994)。

臺灣城市中產階級的食安、食療與環境意識是在公害與食安事件頻傳的1980年代同步興起。²⁷《漢聲雜誌》於1982、1983、1986年密集推出〈稻米專輯〉、〈真味〉、〈食品安全〉等八個專題，形塑了此時由食安觀點啟蒙的農食意識。²⁸1986年也是農委會首度邀集專家評估臺灣有機農業可行性的起點，但還要再過十年（1995年）政府才開始推廣有機農業。80年代重要的食農意識推動者還包括加州琉璃光養生中心的雷久南醫師，其影響力及於1992年創辦福智事業體（包括慈心有機認證機構與里仁商店）的日常法師，以及許多於1990年代投身無毒耕作的農友。90年代初期，一群富環境與消費運動經驗的女性受日本「生活者運動」啟發而創辦主婦聯盟共同購買運動，成為許多產消連結創新實驗的溫床；而多位共同購買運動的早期參與者，也將在下一個十年成為引領臺灣新農浪潮的關鍵人物。²⁹

「愛鄉返土」與「在地消費」兩股力量在新世紀的臺灣逐步合流。921震災重建、臺灣加入WTO、「白米炸彈客」與《無米樂》捲動的農鄉關懷潮延續經年。重建經費的長期挹注更使許多在地實踐有了深耕的機會。³⁰此時亦首見初入農耕領域的新農，以個人或團體名義展開「穀東認購」的短鏈產消實驗，這些志願務農者在產消過程中組織自然與社會資源的方式（強調生態耕作、過程透明、社群互助、不只營利取向等），則成為能見度極高的新農實踐場域。³¹就在上述實踐涓滴積累的同時，工業型農食生產體系則不斷爆發全球性與在地性的危機：2006-8年間，由美澳小麥歉收、歐盟與美國推動生質能源、新興國家肉食需求成長、國際油價飆漲所引發的全球性糧價震盪，促使農委會在2010年首度積極回應臺灣糧食自給率長期低落的問題。³²而從塑化劑

27 劉華真(2011)提醒我們農漁民早於70年代就因工業污染與生存資源襲奪而成為臺灣環境運動最早的主體，只是他們抗爭的身影隨著80年代知識中產階級的介入而消失了。

28 瞿明磊(2016)。

29 臺灣有機運動的早期發展，見吳美雲總編(1996a, 1996b, 1996c)、吳東傑(2006)、陳玠廷(2014)、臺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2015)。

30 例如苗栗大安溪部落共同廚房、南投中寮的溪底遙學習農園等。2000年中葉臺灣三農問題與突圍的紀錄，見〈休耕啓示錄——農地休耕政策的破敗與出路〉（何榮幸、高有智 2005）。

31 參見李寶蓮(2004)、賴青松(2007)、賴爾柔與戴君玲(2010)。

32 除開明顯近因，全球性糧價上漲的本源在於跨國農企壟斷農糧貿易，造成糧食供應體系的結構性不穩定(Holt-Gimenez 2011: 312)。臺灣以熱量為計算基礎的糧食自給率從1994年起始終低於40%，2005年後更瀕近30%。2008年後農委會宣誓十年內提

(2011)、含瘦肉精美牛進口(2012)、修飾澱粉(2013)、混充食用油(2013)、混充食米(2013)、無米米粉(2013)、造假湯頭(2014)、餿水油(2014)，到多起以工業級原料進行食品加工(2015)的密集食安風波，更使消費者的危機意識大幅提升，從而帶動無毒、有機農產市場的成長。

總之，臺灣當代新農浪潮包含對依附型發展的去殖民回歸，更由工業型農食體系的危機獲取行動能量。然而新農浪潮與工業型農食體系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如果我們理解農業是由自然（生產資源）、農民（勞動者）與糧食（勞動的社會結果）三大環節組成，那麼臺灣農業此刻面臨的生產資源流失（耕地變建地、河川污染與降雨不均、種源劣化與消失）、勞動力短缺（從業人口減少與老化），以及層出不窮的食安風暴，代表每個環節都正面臨著嚴苛的生存危機。³³部分問題源自國家職能退縮、放任業者「自主」管理的新自由主義治理趨勢，部分來自農食部門內化跨國資本的操作邏輯，包括農糧與食品貿易的自由化，以及食品製造業的金融化（投資地產而外包生產本業）等。³⁴在此情境下，行動者固然可以從工業型農食體系的危機進行社會動員（如食安風暴賦予修法契機，順勢將基改食品納管），但是這些危機往往很難如倡議者所願進一步開啓社會大眾對工業化農食體系的反省。更常發生的反而是工業化農食體系藉危機而拓展利基市場(niche market)，例如多次驗出販售農藥超標蔬菜的大型連鎖超市設立快篩中心與小農銷售平台，從而將系統性的問題簡化為消費者看得見也摸得到的「多元選擇」與「檢驗保證」。

在農食領域之外，新自由主義為當代勞動、居住、糧食供給、社群歸屬等基本生存需求所帶來的高度不可決狀態(indeterminacy)，更為當代新農浪潮帶來根本而矛盾的影響。僅從勞動的角度觀察，臺灣近年平均勞動條件惡化、薪資實質所得倒退十五年的趨勢，除了造成都市受薪階級普遍的窮忙現象，³⁵也同時縮小了「從農」與「上班」之間的心理與物質距離。都會房價所得比全球最高的現實，加上實質交通與虛擬網路的便利，則促使城鄉關係相對位移，宜蘭、埔里、斗六、嘉義等區域型城鎮開始吸引青壯人才移居，並連帶創造附

升糧食自給率為34%，2011年加碼至40%。

33 三大環節見范德普勒格(2013[2008])。

34 參見陳信行(2016)。

35 林宗弘等人(2011：25、63、105)。

近鄉城之間更多的串連可能。³⁶這些都是大環境鼓勵青年從農的背景因素，但也同時揭示青壯農民增加的部分原因在於農與非農部門在勞動條件上的差距已經縮小。換言之，當彈性工時逐漸取代終身雇用成為勞動常態，城鄉勞動力的逆向流動也該被視為整體社會勞動彈性的效應與延伸。³⁷綜言之，新農浪潮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關係充滿張力，也比多數行動者所想像的更難定性。

（三）宜蘭：農藝復興最前線

宜蘭是近十年全臺農舍炒作最嚴重的地區，也是臺灣第一個新農團體友善耕作小農聯盟的誕生地；臺灣新農浪潮的矛盾正在蘭陽平原上激烈開展。宜蘭農舍潮突顯的是臺灣農業的核心困境：農地資產價值已遠大於其生產價值，致使耕地快速流失與零碎化。³⁸臺灣農地的高資產價值，來自其極度低廉的持有成本與浮濫的套利機制：持有人無須務農即可收取每年一次的休耕與轉作補貼，平時免繳地價稅，屆齡可月領老農津貼，最後還可高價賣出蓋農舍。這些不再農有也不農用的農地，在政治意義上是國家給老農的退休金，實際上則淪為臺灣地產霸權的禁鬻與跨國金融資本的遊戲場。³⁹臺灣農業核心困境的另一端，則是農地生產價值的低落，源於前述依附型發展模式對於農業部門產值的長期壓抑。綜觀臺灣從1993年起推動農業結構轉型(=市場化)的成果是：2015年的糧食自給率僅達34%，2014年農業人口僅占總就業人口4.9%且平均年齡高達62歲，農牧戶平均所得為全體家庭平均所得八成，農業淨收入僅占農家所得兩成、並僅足以支付三成家戶消費支出。⁴⁰面對艱困的產銷處境，加上不斷上漲的農地價格，莫怪許多農民選擇離農售地，並且普遍貶抑自己與土地的勞動生產價值。

在這個農地以坪計價，傳統農業與農村價值看似全面退守的情境中，卻

36 莊雅仲與陳淑容(2016)在本專題的文章指出，這些中型城鎮所帶動的城鄉新連結還有更深厚的歷史與物質基礎。

37 在此臺灣的農民資格多根據農地所有權採形式認定，買不起土地的新農難有農民資格，也因此無法享有農保或任何相關貸款與補助。在此狀況下務農尤其近似於彈性勞動。本段相關論點部分受到張正衡日本定年歸農研究的啟發，特此致謝。

38 宜蘭的農舍數量是從2000年總統大選前夕、國民兩黨聯手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後開始成長，2010-14年間以平均一天兩幢的速度暴增，累計總數已占全臺農舍三分之二強。

39 臺灣農地的高套利機制還與浮濫的國土開發有關。這些開發案多由地方政府以各種園區之名進行徵收，形同強迫農民低價賣地，再由建商開發為住宅區。

40 參見農委會(2016)。

有人逆勢操作，相繼投身耕耘宜蘭的土地。他們有的是一輩子立足於此的農人，有的是初次拿起鋤頭的菜鳥農夫或新移民，最早串連兩者的則是「友善耕作小農聯盟籌備會」（以下稱「小農聯盟」）。友善小農聯盟成立於2009年春天，召集人是自1999年起在梨山專職從事果樹耕作，並將這段經歷成書引起極大迴響的李寶蓮（以下簡稱阿寶）。2007年阿寶將部分生活重心轉移至家鄉宜蘭，逐步嘗試水稻與雜糧耕作。早歲即投身高山保育工作的阿寶，自承上山前還曾期待臺灣加入WTO後，大量進口的溫帶水果可以終結梨山果園問題，直到下山接觸平地農事後才對臺灣農業有較為整體性的理解。2009年3月，阿寶邀集一群在宜蘭從事生態型農耕的農人，包括當時已在員山鄉深溝村務農六年的「穀東俱樂部」負責人賴青松，以及將蘭陽溪口沙地化為菜園綠洲的「加留沙埔農場」負責人楊文獻，正式展開小農聯盟的籌備工作。

從召集籌備到正式運作，小農聯盟的成員屢有遞嬗，但大致維持15-20位參與者。他們之中有因健康因素轉以生態農法耕作的在地老農，有為兒女教育離開竹科返鄉的中年轉業農，也有園藝科班出身的青年菜農情侶。聯盟成員們的作物與產品則日趨多元，從初期集中於稻米與蔬菜，逐步拓展至水果、雜糧、芽菜、蜂蜜，以及各種農產加工品。除了共同銷售，聯盟成員的共識是進行「友善耕作」，亦即遵守「不用農藥，不用化肥，不傷害對作物無害的生命，避免使用進口資材」的耕作原則。⁴¹從2009年9月到2013年底，聯盟成員也與以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為主的核心理志工群合作經營「宜蘭大宅院友善小農市集」（以下稱「大宅院市集」），以每兩週一次的頻率先後在冬山鄉與宜蘭市區擺攤開市。大宅院不只成為宜蘭另類農食網絡的重要支點，也曾以其素樸的社群風格在百花齊放的臺灣農民市集運動中占有一席之地。

仔細深究，大宅院本身可說是不同時代歸農運動跨代遭逢的結晶。根據賴青松傳神的說法，當友善小農遇上華德福社群，就像「飛龍遇上地虎，才有了腳，讓天馬行空的理想落地生根。」然而飛龍與地虎何以相遇？華德福教育所本的奧地利神祕主義哲學家魯道夫·史代納 (Rudolf Steiner, 1961-1925) 正是有機運動的思想先行者，風行於歐洲的生機互動農法，即以他發表於

41 引自友善耕作小農聯盟的第一張文宣，製作於2009年6月。綠黨花蓮縣長參選人齊淑英於2003年首度喊出友善農業政見，標榜有別於有機農業的整體性政策考量，見〈齊淑英高喊友善農業〉（王燕華 2003）。

airiti

1924年的農業講座以及人智學「靈性科學」為基礎。⁴²由於此一特殊的跨國脈絡，宜蘭慈心華德福小學除了開啓臺灣校園農耕課程的先例，更有不少家長親身投入友善耕作並成為小農聯盟與大宅院的農友。華德福社群與友善小農相遇的另一個關鍵脈絡，則是新自由主義化下城鄉關係的重新組裝。大宅院的主事者幾乎都是宜蘭的新移民與返鄉新農；她們或為了環境理念與追求生活相對自主性而選擇務農、或為了讓兒女就讀慈心華德福學校而遷居宜蘭。有不少家庭是一人在臺北工作，另一位帶小孩住宜蘭並投入「大宅院市集管理委員會」，貢獻先前在不同職場領域磨練出來的專長，而成為如慢食運動中強調的「協同生產者」（co-producer，佩屈尼 2009）。高速公路為宜蘭帶來土地商品化的困境，卻也帶來新的人才與連結。我們在此再次看見當代新農浪潮的內在張力。

2012年中，小農聯盟決定自我解散，大宅院市集也因志工人力不足於2013年底暫停舉辦。⁴³然而「友善耕作」的名稱與論述已經有了自己的生命。2012年底，另一群宜蘭新農發起「倆佰甲」平台，以提供租地、田間管理技術、倉儲服務以及統包機械代耕業者等方式降低友善水稻耕作的入門門檻。截至2016年，倆佰甲以協力互助的方式帶領50幾組新農進場，至今累計擴增友善耕作水稻田面積也已超過50甲。

「大宅院市集」與「倆佰甲」分別從消費端與生產端為臺灣新農運動開創新局，不用農藥與化肥的「友善耕作」則是串連兩者的核心論述。宜蘭友善耕作社群裡的農民，部分群聚於員山鄉的深溝、藜巷、內城、大湖等村，其餘散居宜蘭各地。他們多以水稻為主要作物，部分為蔬菜專業農，少數兼作水稻、雜糧或蔬菜。多數人的家庭、教育與先前工作背景與農無關。相較於更早投入友善小農市集的慈心華德福家長，此一新農社群不只成為農人的「協同生產者」，而是直接走進農業生產最前線，同時成為生態型農業的消

42 化學農業（及其化約式的唯物主義預設）視生物之間的關係為機械式的，因此認為植物成長需要什麼元素即可透過肥料供應。生機互動農業及其所本的靈性科學則視人體、農場、地球皆為一個生命體(living organism)，並由此對人與自然的關係提出一套互動式的理解系統（Paull 2011；郭華仁 2012）。

43 核心組織者碧芬則認為停辦是因為生產者已經另有通路，這代表大宅院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

費者與生產者。⁴⁴本文統稱她們為「友善小農」，主要因為這是深溝村民稱呼他們的方式，也因為他們自視為「友善耕作」的後繼實踐與論述者。⁴⁵此外，儘管每一位小農都別具想法與高度實踐力，本文將盡量以社群為最主要的敘事與分析單位。我希望讀者們看見在極具魅力的新農身邊，還站著他們的作物、害蟲、雜草、地主、鄰田老農、小農夥伴、代耕業者、傳播中介者，與消費支持者。藉由交互生成的「農義／農譯／農藝」實作，這些角色與目標殊異的行動者共同成就了臺灣當代農藝復興。

三、農義／譯／藝復興

(一) 農義復興：重新定義農的尺度與價值

2010年春天的宜蘭，阿寶與初展半農生涯的女農游麗花合作成立「福豆田」，在員山鄉內城村近一甲的砂質旱田上嘗試雜糧耕作。黃豆、黑豆、綠豆、花生、樹豆、亞麻、向日葵、小麥……宜蘭能種的都種了，只盼提升臺灣不到3%的雜糧自給率。然而雜糧耕作的機械化程度原本就不如水稻，何況兩位女農耕作規模小，不符合機械耕作效益（比如花生至少得上千斤才能以機器脫殼），因此從開溝、播種、採收、脫粒、脫殼到選豆，每一道都是手工製程。兩位雜糧耕作的生手因此必須從頭學習每樣作物的處理方式。抱著「學師仔」的態度，阿寶和麗花向在地老農探問相關的勞動技巧和習慣，問不到的部分就邊做邊摸索。為了將黃豆與黑豆從豆莢取出，兩人先頂著午後赤陽曬豆莢，曬不裂的就用腳踩，踩不裂的再用手持棒子翻打，最後還無法脫粒的再以手剝莢取出。根據我一個下午的目視估計，整片堆疊起來面積約4平方公尺的黃豆乾株大概只產出半個肥料袋的生豆，而這還得等兩人接下來用網篩、手挑等細工一步步將豆堆裡的砂礫與碎葉挑出，才成為足堪上市的好豆。不過這一切和處理綠豆比起來還

44 此想法最早來自於與楊文全的談話。近年有更多農村子弟返鄉務農（俗稱「農二代」），他們具有農民身份，經營模式多朝擴充代耕設備與農機具發展，與多數僅從事田間管理與銷售工作的「農一代」新農的長期差異值得觀察。

45 這是一個不具正式組織邊界的社群，在臉書上有一個封閉社團，內有150餘名成員，我也是其中之一。2015年5月中有位社團成員請社團成員自願性地提供資料，3天內收集了約33組新農的網頁連結，其中約2/3為兩人（含）以上共同務農。

算輕鬆：分批熟成的綠豆，從採收到後續的處理又遠較整批熟成的黃黑豆更為細瑣。友善耕作需要如許的心血投入，這一切的努力到底爲了什麼？

豆子收成後不久，我再訪阿寶員山內城的住處。她先從廚房拿出水煮毛豆與紫蘇酵素茶，回到客廳茶几前坐下，面前是一箱朋友幫忙收集來的回收保麗龍水果保護套，談天時手上依然工作不停。「阿寶以一個寓言式的情境回答我的提問：「爲什麼友善耕作？」

我最近常常在思索桃花源的故事：桃花源這群人是怎麼進去的？他們如何生存？回到文本，他們是爲了避秦之亂，這其實跟現在社會的發展有點像……亂象之中人心要求安頓，但安頓並不是憑空而來。他們爲了避秦暴政，躲進與世隔絕的深山，他們需要的其實很少；他不需要政權國家，也不需要科技，不需要文墨的東西，但是他需要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當這群人中有一些很基礎的工匠，特別是能夠生產的農人，桃花源就有其可能。……但這個東西會失傳。所以，小農的經驗或者技藝、他生活的習慣或勞動的價值觀，其實都在爲這個桃花源鋪路，綁路標。

阿寶是友善耕作論述的主要開創與推動者，以上引言則是我所知阿寶對友善耕作最精要的闡述。阿寶以一個寓言回答我的提問，寓言的基本設定指向一個結構性的變化。無論起因是石化能源遽減、氣候驟變、大型災難，或人心思避，這個變化都將使既有的糧食生產方式無以爲繼，並使在地生態型的小農農耕成爲人們賴以求生的關鍵技藝。⁴⁷換言之，這個寓言首先彰顯了農產品作爲「糧食」的本質，將其由「商品」（再度）回歸至「生存必需品」的社會範疇，⁴⁸也由此賦予小農生產者及其農耕技藝一個至爲關鍵的公共角色：當工業型農耕面臨結構性失靈，生態型的小農耕作將成爲人類的生存依憑。

阿寶的桃花源寓言也重新構連了農的時空尺度。威廉斯在《鄉村與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中曾言，工業資本主義造成了農在「時空上的錯位」，以致於它「只可能與過去或遙遠的地方聯繫起來。」（威廉斯 2013

46 如無另外註明，所有相關引文皆來自於與李寶蓮的日常對話與一次正式訪談(2010/04/19)。

47 這是西方新農論述中常見的關於一個生態失衡、資源枯竭、危機四伏的地球的「星球危機」(planetary crisis)想像。人類學者 Joseph Masco(2010)指出，冷戰時期美國爲了軍事情蒐與核爆試驗而發展出史上第一套量化與監測全球環境的計算機系統。這套技術網絡從80年代開始陸續提出關於「溫室效應」與「全球暖化」的觀察，也成爲生態型農耕的普世論述基礎，但它卻是美蘇核武競賽的無意圖結果。美國國防部至今不願意承認「氣候變遷」是一個現象而非假設。

48 這個想法最初來自彭明輝(2012)。

〔1975〕：405）阿寶的桃花源寓言則在時間向度上將農從「過去」拉進當代與未來議題的核心，指出生態型農耕將在危機時刻成爲人類存活的關鍵技藝。在空間尺度上，阿寶則讓農成爲同時關乎「全球」與「在地」、「個人」與「人類」的課題，前提是其生產尺度必須小，才有辦法以分散、在地、循環型的能源利用模式生產糧食。是在這個意義上，友善耕作雖然強調在地生產與消費，但其核心關懷卻一點也不在地，而是以全體人類社會爲尺度，強調友善耕作小農自在自爲，卻同時以衆生爲懷的性格。這是將個體小農的價值置入普世的價值場域，藉此重新爲農——尤其是以無化肥、無農藥方式生產的在地「小農」——找到其普世性的意義。⁴⁹可以說，小農的實踐尺度雖然小，但其價值尺度也正因此而大。友善小農論述與臺灣農業政策最大的歧義點也在此：無論是針對有機或工業型農業，農政單位始終以集團化、規模化、企業化作爲臺灣耕地零碎、人力缺乏「問題」的正解。友善小農論述卻反其道而行，正面強調小農耕作在生態意義上的正面價值。

第三，除了生態價值，友善耕作還強調農的社會性價值，而這具體展現在大宅院友善市集的風貌上：市場現場強調柔性色彩的攤位布置、反映時令的主題活動、農食紀錄片放映與好書交換機制、約定市集不販售葷食、希望來訪團體以不插電方式進行演出、鼓勵消費者自備食器，父母鼓勵孩子自力擺攤……，種種安排除了反映華德福社群追求的理想生活風貌，也等於以實作具體闡述生態型小農產消模式在重建社會關係、活絡在地經濟、發展社群認同、減少石化依賴的全面性多元價值。大宅院的例子具體說明：友善耕作不只具有生態上的正面意義，還能引動更多關於人本經濟與社群生活的具體實踐。

社會學者李丁讚近年以「災難社會」與「公民農業」爲題的系列書寫（2010, 2011），對於生態農耕之於當代生活世界的整體性(holistic)意義進行了更爲完整的論述。李氏指出，全球南北、城鄉、貧富之間急遽擴大的差距，代表新自由主義下的全球競爭體系已經造成產業鏈底層社會全面性的崩壞，唯有透過公民農業(civil agriculture)，也就是建立在民主與合作的社會關係之上的生態型農業，才能重新連結土地與社區、再造社群連帶、恢復地方經

49 「在地」的不同尺度與意涵值得注意：臺灣政府（襲自日本）的「一鄉一特色」論述的空間尺度就比大宅院強調的「宜蘭在地」爲小。而友善耕作的理想耕作尺度是個體小農式的多種作物混植，這又比「一鄉一特色」的單一大面積規模經濟要小很多。

airiti

濟、重建地方文化，進而解決農與工、城與鄉之間的不均發展。這是以博蘭尼(Karl Polanyi, 1886-1964)的資本主義市場「去鑲嵌化」理論為經，以臺灣近年一系列風災、金融、食安災難為緯的社會學分析，並由此導出土地與農業的關鍵性意涵：土地是棲地，是被市場解離的社會關係「重新著床 / 再鑲嵌化」(re-embedding)的依憑。循此「市場」vs「社會」的脈絡，李丁讚稱以社會關係為基礎的農業為「公民農業」，並視之為人類社會與自然重新建立非商品化關係的起點。⁵⁰

比較性地來看，「友善耕作」強調小農向自然討生存的求生技藝，「公民農業」強調小農重建生活世界與社群連結的價值；前者突顯人與自然關係的重建，後者進一步強調社群生活與社會世界的再造。時間向度上，前者託言未來，後者則立論於已經破敗的現在。然而兩者都視生態小農農耕，為攸關人類「如何生存」以及「如何活得更好」的集體性與普世性議題，也由此將長期棲居現代性邊緣的農重新置入人類永續未來的核心。我認為，這正是當代新農運動立論正當性的核心基礎：農藝復興，首先必須立基於生態型農耕整體性意義的農「義」復興。此一由「工業」到「生態」的價值典範轉移，其核心意義在於許諾人類與自然關係的轉變：從賤賣自然(cheap nature)以追求無止盡成長的模式，轉變成如生態經濟學家赫爾曼·戴利(Herman Daly, 1938-)所稱的穩態經濟(steady state of economy)，其中所有的經濟行為（包括農業）都必須以地球環境的承載為界。

友善小農對於農的多元價值與整體性想像，也呼應歐盟各國自1980年代中葉起積極發展的農業多功能(multi-functionality)論述，強調農在生態、景觀、認同、社群、文化上的多重價值。學界稱之為「後生產論」的「農業新體制」轉向，以有別於狹義的、以生產為中心的農業觀。⁵¹然而當農業多功能論述從意識成為實作，它所強調的普世價值是否真能普世均霑？⁵²許多觀察者已經指出：新農運動的成果十分不均地為族群與階級優勢的消費社群所享受。在生產端，來自歐盟內部的批評早已指出「農業多功能」政策本身的西歐中心主義，對於歐盟邊緣的西、葡、希臘等國小農不利。⁵³長期研究法國小

50 請參考本專題中陳瑞權的文章(2016)、DuPuis & Gillon(2009)。

51 參見Gray (2000); Buller (2000); 李承嘉(2012)。

52 參見Goodman (2004)。

53 參見Wilson (2001)。

農聯盟(paysan)反基改運動的Chaia Heller近年更以民族誌清楚呈現：即便在地域識別、生態補貼、糧食自給等新農體制支持手段相對完備的法國，小農的處境依然艱難，因為從這些制度中獲益最多的依然是規模化的集團農企。也因此，與其採用「從『生產』到『後生產』」的說法，並想像工業型農業正在或者終將被生態型農業所取代，Heller認為「後工業農業情境」(post-industrial agriculture condition)更能恰當描述歐洲當代農業新舊範式並存、混雜與角力的實相。⁵⁴

Heller的觀察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如前節所述，臺灣當代新農浪潮與工業化農食體系危機的交纏關係，確實指向「生產至上」與「農業多功能」兩種農意識價值典範的競逐。⁵⁵而考量臺灣農業在國際農糧體制中的後進位置，本文進一步認為臺灣面臨的是一個更為混沌的「生產至上，但又追不上」與「提倡農業多功能，但缺乏制度性支持」的後殖民後工業農業情境。⁵⁶不過臺灣新農浪潮對於歐美日AAFns及其生態優位的普世性論述，亦非只是單純的移植與繼受，而已經累積了一段不算短的在地轉譯歷程。⁵⁷前述阿寶在訪問中以桃花源故事新編轉譯西方生態論述中常見的普世「星球危機」想像，從而為「友善耕作」嫁接中文語境裡的重農與耕讀傳統，便是極為精彩的農譯實作。⁵⁸普世宣稱從來不普世，它們總是由極為特定的在地脈絡與考量為中介，

54 參見Heller (2013)。

55 此處的「競逐」並非暗示兩個典範在任何意義上勢均力敵。從預算分配到市場投入，臺灣的工業型農業體系至今仍享有絕對的政經資源優勢。

56 歐盟的農業多功能論，固然是歐洲家庭農場在美洲大規模工業化農業下求生存的另類生產論述，現實上卻形成歐盟對內補貼、再透過自由貿易對外強勢出口的結果。這是在臺灣談論歐盟農業多功能典範時必須看見的限制。

57 例如，從關於農技藝與思想的生機互動農法(biometer farming)、岡田茂吉(Okada Mokichi)的MOA自然農法，由MOA衍生的秀明(shumei)農法、福岡正信(Masanobu Fukuoka)的自然農法、泰國的KKF農法、馬達加斯加的SRI水稻栽培技術、澳洲的樸門永續生活設計(permaculture design)，到農民市集(farmers' market)、慢食運動(slow food)、里山倡議(satomaya initiative)、反基改運動(anti-GMO)、反圍地運動(anti-land-grabbing)、社群協力農業(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都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食物森林(food forest)、可食地景(edible landscape)、公平貿易(fair trade)、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分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等，都是相關行動者在本土情境與全球論述之間翻譯的工作成果。

58 漢農業帝國原本即有「農為國本」、「民以食為天」的說法；臺灣現代社會的發展路徑雖然已是工業優位，但舊的農意識仍有其影響力。如果不是觸動了「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的常民文化價值，又或者怪手摧毀的是小米田，2010年大埔怪手毀田事件不會延燒為政治風暴。其他的農意識至少還包括：佛教與道教的淨土思

並在譯介的過程中逐步組裝其「在地的」普世性(becoming locally universal)；農藝復興也絕非單線性的典範更替與切換，而有賴新舊農意識之間的相互譯註。以下，就讓我們具體進入「友善耕作」從臺灣民間有機運動發端的在地脈絡，並看見其中蓬勃發生的農譯實作。

(二) 農譯復興

1. 從「多元有機」到「認證有機」

根據陳玠廷的博士論文研究，臺灣主流媒體的有機論述始於1976年一篇對歐美日相關文獻的譯介，其後並歷經數個時期的發展，每個時期的「有機」意涵也隨之轉變。為求簡明，本文將在介紹每個不同的「有機」觀點之後以數字標註。陳玠廷指出，臺灣有機運動的發展初期強調有機是一種「復古農業」(1)，以及對環境與人體健康有正面助益的產業(2)⁵⁹1990年代，媒體普遍強調有機的食品安全價值(3)，並認為有機是一股另類商機(4)。2007年後，有機的意涵進一步開展，包括給予農民合理的價格支持(5)，並能重建產銷之間的信任關係。(6)此時期氣候變遷問題漸受重視，有機農業日益被視為「低碳農業」並列入臺灣民間外交議程的具體策略(7)。及至2009年莫拉克風災重創南臺灣山林，有機農業又成為重建自然生態與在地生計的重點產業(8)。⁶⁰此外，根據劉亮佑對於臺東地區「良質米」的發展研究，1990年代的農政體系還將「推有機」視為臺灣水稻產業面對WTO自由貿易壓力、透過品質升級求自救的手段與出路(9)。⁶¹而對於我在宜蘭遇見的絕大多數有機農民先行

想、80年代以降的「簡樸生活」書寫與實踐，以及「鄉土」的思想系譜。1982年的漢聲《稻米專集》就是一個建構「臺灣農+中國鄉土連續體」的經典農譯表現，以「臺灣同時是中國農業文明最佳縮影、延續與發揚者」為基調，本專輯將詩經后稷神話、河姆渡文化、南宋農書、清代耕織圖、頭城農民乘舟收割、美濃觀祀，全部整編為一個同質無時間的想像共同體。這個透過水稻文化建立的鄉土連續體，在80年代末被臺灣「本土」想像取代，之後又為多元主義與原住民土地保育自然觀所挑戰。參見邱貴芬(2007)。

59 值得注意的是，有機是「復古農業」的說法來自於美國有機運動重要推手Rodale Institute的負責人Robert Rodale訪臺後在*Organic Gardening and Farming*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文中表示對「中國人古老生產模式」的推崇：「我最近訪問過臺灣，就發現臺灣農村可能是全世界應用化學藥劑最多的地區。可是，農藥與化學肥料的洗禮，並無損於中國人古老的生產模式。一旦除去這些化學藥劑，古老的法則仍可照常運轉」。本文的中文編譯版〈美國人眼中的中國智慧〉是臺灣平面媒體最早對有機農業的報導(1976：頁8，引自陳玠廷(2014: 105))。

60 陳玠廷(2014)，尤其第四章。

61 劉亮佑(2014)。

者來說，「種有機」則是農人逃離工業型農業毒物循環的自保之道(10)。⁶²

從上可知，臺灣的有機論述雖然源於美日，但很快就演變為一個多元觀點並行而且結合在地脈絡的異質論域；從農民、農政單位、通路商、消費者權益團體、強調國際參與的非政府組織、環境倡議團體、社區重建工作者，都各自闡譯了「有機」的相關意義。2007年，農委會陸續透過三項行政管理辦法嘗試明文化「有機農產品」的法律定義，並於相關罰則中規定未經第三方認證者不得自稱「有機」，形同以法律強制收斂並統整臺灣社會中原本多元歧異的「有機」話語權。一場關於「什麼是真正有機」的社會論辯就此登場，聚焦於有機農產的認定究竟該取決於生產過程（＝不用農藥），或是檢驗結果（＝無驗出農藥）。在消費者團體的強烈反對下，農委會最後放棄原擬參照國外有機標準、允許5%農藥殘留作為鄰田污染或檢驗瑕疵的差異容許值，轉而採取「不用藥」加上「無殘留」的嚴格認定標準。細看當時的媒體投書，沒有人否認「鄰田污染」在耕作面積狹小、農藥用量大的臺灣幾乎是不可能排除的現實，只是污染責任該由誰承擔？消費者團體強調「做好鄰田污染的防護設施」是「政府的責任」；然而最終通過的法規卻要求有機農民應在自己的認證田區設置隔離帶，等於是向有機生產者課責（陳玠廷 2014：137）。至於施用農藥造成生態與鄰田污染的工業型農業體系，包括實行數十載的農藥補貼制度，則在討論中全部隱形。工業型農業在臺灣壓倒性的制度優勢，由此可見一斑。

2. 一個友善，各自表述

是在此特定時空脈絡下，阿寶與前述「宜蘭友善耕作小農聯盟籌備會」（簡稱為小農聯盟）的成員們開始倡議「友善耕作」，從「生態優位」的立場加入對有機話語權的競逐。他們呼應來自主婦聯盟、社區重建，與農村工作者的意見，指出臺灣主流有機實踐談健康只談消費者健康、不談生態的健康；看環境只看農場的環境、而非大尺度的全球環境；著眼於終端檢驗結果卻不重視生產過程對整體環境的影響，更很少關懷農民與相關勞動者的需求與權益。⁶³這與國際有機運動強調健康、生態、公平、謹慎(care)的四大原則實有落差。

62 也請參見下一小節陳主委的生命歷程。

63 參見鄭正勇等(2009)、李寶蓮訪談(2010/04/19)。為求引證清晰，本文在此大量引用李寶蓮的訪談內容，但仍強調宜蘭友善耕作論述是由小農聯盟多位成員共同發展、闡譯的論述。2009年下半年，李寶蓮、賴青松、賴嬌燕在宜蘭社大共同開設「全方位的健康與友善耕作」課程，過程中三人對彼此提出的友善耕作觀點相互發揮演繹，即為明證。

仔細回溯當年的思想發展歷程，阿寶在訪談中自承在書寫《女農討山誌》(2004)時曾將有機認證產品定義為一百分、而未獲有機認證者處於0-99分的粗淺認知。但在「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2007)頒布之前，阿寶自己的果樹生產管理標準已遠高於有機法令規範，有機認證對她來說反而只是「60分」。2007年的立法規定非經認證者不能宣稱有機，則讓阿寶意識到必須為「60-100分」劃出辨識度，否則真正的「有機精神」將會隨著粗糙立法而沉淪。2009年3月，阿寶正式提出以「友善」取代「有機」，要以一個「更全方位的名詞來詮釋農對生態環境與對人的照顧」，藉此邀請社會大眾重新思考有機精神及其行動方針。小農聯盟的「友善耕作」因而是阿寶對「有機的原初精神」的再次轉譯。

阿寶進一步說明，宜蘭友善耕作自始強調「永續性」與「人性化」兩大原則。永續性表現在前文曾述及的友善耕作四點原則：「無農藥、無化肥、不傷害對作物無害的生命、避免使用進口資材。」人性化則表現在對小農聯盟會籍資格採取「認人不認證」立場，由具公信力的核心成員二人以上親自面談、實地勘察農場、了解生產流程的方式審查。要言之，友善耕作強調「農人的品質與其田間管理理念，甚於終端產品檢驗。」

值得深究的是，以上「友善耕作」四項原則都是負面表列，是藉由排除友善耕作「不是什麼」而畫出友善耕作「是什麼」的意義邊界。此一開放特質為大宅院市集廣納了一群無意願參與有機認證的小農生產者，然而市集成員們也常常為了原則的實際操作陷入無止盡的討論，直到小農聯盟與大宅院市集停止運作依然未有共識。換言之，作為一個從無到有的本土新農倡議，友善耕作於短短五年間成為臺灣社會的通用語彙，背後並有一群從論述到行動、從生產到消費的協同工作者，然而這些行動者對於友善耕作的具體操作方法，尤其是關於如何落實「不傷害對作物無害的生命、避免使用進口資材」兩點，並無絕對共識。更準確地說，對於友善耕作農法的具體共識並非這些行動者合作的前提性要件，而是她們合作的實驗性目標。以阿寶自己的話來說：「開放性的立意，是希望讓每個小農的話語權都受到一定的尊重，從而產生大家對友善耕作更完整而深入的理解與實踐，因此過程中無止盡的討論原本就是被設定的一種學習與共同演繹。」這是「友善耕作」倡議在農法上自始即具備的「無共識合作」性格。⁶⁴

64 「無共識合作」來自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者 Star(1999)，她以「無共識合作」突顯來自不同生活世界、複數社群之間的合作，並非指這些社群之間毫無共識。本文則想

2010-12年間，正當宜蘭友善小農們還論辯著友善耕作的操作型定義時，一個社群之外、以友善為名的農產品市場也逐漸成形。究其實質，這些農產多指「沒有有機認證」的生態友善產品，有時甚至是「減用農藥」或「用藥而無農藥殘留」產品的代稱，而與友善耕作初始「無農藥、無化肥」的主張大相逕庭。總之，隨著友善耕作之名日漸普及，其相關論述與實踐也漸形多元，不同實踐之間甚至互有矛盾。友善耕作彷彿是一個開放源碼(open source)，成為諸多異質他者不斷轉譯的對象。2012年，原本言必稱「有機」的農政單位也將「友善」農業納入補助範圍。2013年12月，宜蘭縣政府開辦「星期五農民市集」，開幕當日縣府大廳現場掛出「支持有機友善耕作」、「幸福宜蘭有機生活」一雙對聯，強調底正是對有機與友善的平行認可與雙軌支持。如前所述，友善耕作是由一群強調生態優位的新農、在臺灣有機運動的意涵從多元走向單一的關鍵時刻，對認證有機背後的國家管理主義與資本集中趨勢的雙重拒絕。然而國家與市場很快地又反向吸納友善耕作，前者將其視為有機的併行論述（因此友善耕作確實部分成功鬆綁國家對有機的壟斷性話語權），後者更以「友善」之名積極搶佔食安風波下社會大眾渴求安全食品的經濟動能。來自國家、市場、民間的多方行動者就在「一個友善，各自表述」的框架下各自轉譯「友善耕作」，並以此競逐「友善耕作」的市場動能與社會想像。

3. 「復古做有機」

即便各路人馬爭相挪用與重新定義友善耕作，我所認識最精彩的轉譯者始終是深溝村的資深農民陳榮昌先生，本文在此遵從社群慣例尊稱他為「陳老主委」或「主委阿伯」。⁶⁵2014年，在一場農民對農民(farmer to farmer)的演講中，陳榮昌老主委對一群宜蘭冬山鄉補城社區的老農詳細說明自己從使用農藥與化肥的慣行農耕轉行友善耕作的心路歷程。陳主委首先回憶1950年代末期以前臺灣農村種稻原本就是「純有機的」，後來政府進口肥料與農藥，農民為了追求產量而過量用藥，「消費者可憐，噴藥的農民自己也倒在田裡。」直到1990年間因健康亮起警訊，陳老主委主動放棄施藥與化肥，身體

藉此語彙突顯，宜蘭友善耕作在理念與制度設計上，允許農友在最低限度原則（＝無農藥、無化肥）之上再因地制宜、各自實踐與表述如何落實「不傷害對作物無害的生命、避免使用進口資材」等兩項較高標準的原則，則代表同一個社群內部的行動者也可能進行無共識的合作，甚至以「無共識合作」作為社群集結行動的目標。

65 因為陳先生曾經多年擔任深溝村信仰中心三官宮的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airiti

逐漸恢復健康，才體會種有機的好處。陳老主委鼓勵農友轉作有機的第一個理由因而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健康；其次才是老農的經驗與技術優勢：「老農來作比新農更快。因為以前都做過，堆肥怎麼堆都知道，回憶想起來就知道，所以不用煩惱技術。」而他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理由，更一針見血地道出工業化農業稻作小農在國家與資本夾縫中的無奈窘境：「政府（收購價）追不上我們的資本（投入），所以種田才變成『做義務的』。」反觀種有機這條路：「無毒稻米出來，顧起來也相當水，不用農藥無化肥，也有一甲地八千斤耶，算起來跟我拼農業拼化肥，利潤還多一些。」⁶⁶

陳老主委至少在三層意義上參與了前述的「有機」與「友善」對話。首先，國家試圖透過認證制度與罰則壟斷有機話語權，但是在老主委眼中，綠色革命以前的農法原本就是「純有機的」，所以無論有機或者友善耕作都只是在「復古做有機」。其次，新農社群從國家的認證有機中另闢「友善耕作」蹊徑，相關論述傾向強調環境與生態的優位性；陳老主委的三點理由則全部只談做有機對生產者的好處：健康、技術優勢、利潤多。主委的論點清楚說明：「做有機」之於他自己與一般農民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幫助農民跳脫資本與國家對農民在勞動與健康上的雙重剝削。這與友善耕作論述裡的生態優位、或官方有機論述中的消費者優位不同，而是小農生產者優位的立場。陳老主委的「復古做有機」因此不只翻譯、也同時翻轉了主流的「有機」與「友善」論述。

2015年，隨著與新農社群的互動愈深，主委阿伯也開始更常在對話中採用「友善小農」一詞。某次我藉機請教，深溝村大廟三官宮裡的主神「三界公」，究竟是何方神聖？老人家極有耐心地娓娓分說：「三界公」（或稱三官大帝）指天官、地官、水官大帝，同時也分別是遠古神話中的堯、舜、禹三位聖賢明君。說到這裡，阿伯特別又主動介紹地官大帝「舜」，說他出身農民，至孝純良，引來百獸幫忙耕作，傳為佳話，也因此獲「堯」禪讓帝位，開啓了漢神話中傳賢不傳子的理想政治典範。在古雅的全閩南語敘事最後，陳老主委以臺灣國語加了一句：「你看，這位舜帝有百獸、禽鳥與各種

66 陳主委的看法呼應了Rodale Institute最新的比較研究成果(2015)。經過34年的長期實驗，使用生態方法耕作的玉米與黃豆田，比起使用化肥與農藥耕作的田產量相等、作物對雜草的競爭力較高、土壤有機質增加，也因此乾旱時期更具有保水性而更能維持產量。這代表農人以較少的投入得到相同甚至（在旱季時）更高的產量，證明從事生態耕作的農人獲得較高的利潤。

昆蟲來幫他種田。你不覺得他就是一位『友善小農』嗎？」

主委與阿寶的農譯實作幫助我們看見「翻譯」的多元層次：首先，就像阿寶以武陵人入桃花源說明友善耕作的價值，主委也以「百獸助耕」的神話典故呼應友善小農與自然協力耕作的生態關懷；這是讓新舊農文化互為註解的跨文化(transcultural)轉譯。主委以閩南語向其他老農說明「友善小農」，則是跨語際(translingual)翻譯。此外，主委樂於回答新農在農事、歷史，與環境知識上的種種提問，以極為生動的語言傳承經驗性的實作知識；而阿寶在「學師仔」後再以優美的文字紀錄宜蘭在地農務知識，兩者都屬於想法與實作互譯的跨知識類型(transmodal)翻譯。從桃花源寓言、復古做有機，到上古農政烏托邦，阿寶與陳主委穿梭於各種新舊農意識間，以靈活的農譯實作豐富了「友善耕作」的意涵。以下，我們還將進一步深入兩個以「農藝」進行「農譯」的場域，首先以農業雜誌《鄉間小路》的轉型具體了解藝文工作如何與農結合，其次探討友善新農如何藉由生態型農技藝轉譯農的多元價值。

(三) 消費端的農譯 / 藝復興

1. 走在《鄉間小路》上

1975年，原本隸屬於農復會的豐年社發行《農業週刊》，定位為針對生產者與消費者報導農業新知的刊物，1989年更名為《鄉間小路》（以下簡稱《鄉間》），1991年再改制為月刊。《鄉間》長年反映體制內的「農業推廣」觀點，它的轉變也因此別具指標性意義。2009年，剛完成大眾傳播碩士論文的沈岱樺決定投入與農相關的媒體工作。毫無農業相關學經歷的她主動向豐年社毛遂自薦自投履歷，也意外地馬上獲得回應。「總編輯馬上連絡我，因為豐年社很少有年輕人主動求職，就算有也來自臺大或中興農藝等相關科系。」⁶⁷當時《鄉間》正打算轉型為美食雜誌，岱樺卻說服總編輯「農業生活雜誌」才是值得經營的特色定位。但何謂「農業生活」？2013年春天在清大水木咖啡受訪的岱樺如此解釋：「我們不要讓農業只受限於生產這一個區塊。……我們已經有一本很專業的《豐年》雜誌，那是服務農民、分享技術；《鄉間》是要把農人耕作的故事、什麼季節要吃什麼，也就是生產以外的面向，可能是環境，可能我們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跟農業相關的，甚至可能包

67 本小節的資料皆來自沈岱樺訪談紀錄(2013/05/08)與王春子訪談紀錄(2013/10/19)，未另加註的引言都來自沈岱樺訪談紀錄(2013/05/08)。

括工藝的、職人的，也就是那些農業裡比較生活面向的。」時值民國百年風潮，《鄉間》趁勢改版，目的設定為吸引「農業與農學專業以外的讀者」。

於是，2010年底由採訪編輯轉任執行編輯的岱樺，於2011年4月開始與剪紙藝術家吳耿禎、插畫家王春子合作，為《鄉間》重新進行視覺設計。6月起，饒富民藝趣味的剪紙作品，取代了長年以農產品近照當封面的雜誌傳統，版型、紙質、欄位與配圖方式也同步改版，以「吸引更多讀者翻開雜誌」。當視覺改版大獲好評，2012年度的《鄉間》進一步在內容上求變，改用「比較軟性的說故事方式」，降低文字難度、減少文長、搭配圖片，並在封面故事之前新增數個常設性專欄。「我想告訴別人農業是生活的，你可以從書、從建築、從音樂、從電影都看到農業，也知道有不同領域的人都在關注這一塊。」此外，每期的主題單元呼應從產地到餐桌的原則，專題系列文章必定先從食材說起，次談生產者，再談料理方式，最後逐步旁及此食材在生活其他面向的應用可能。行銷上則積極拓展通路，除了讓《鄉間》進連鎖書店通路、上博客來網購平台，岱樺也利用辦公室的地利之便，主動與溫州街附近的獨立空間談寄售並合辦相關講座。從外觀、內容到銷售網絡，改版後的《鄉間》引進藝文工作者的專業與資源，從而讓雜誌一步步走出既有的農學、農政與農推體系，也將「農」一步步帶入城市中心的咖啡館、巷弄書店、生活風格產業，與主流商業雜誌的視野。

《鄉間》的成功改版帶來許多肯定。除了通路廣及於連鎖、網路與獨立書店，改版後的內容更大獲好評，而在競爭激烈的雜誌圈異軍突起。2013年岱樺受邀至香港分享經驗；春子成為相關出版領域的熱門插畫家，母親鄭秀鑾女士則由家庭主婦搖身一變，成為《鄉間》備受歡迎的「泥地字花」專欄作者，2014年更集結專欄文字、並搭配夫婿手繪的插圖出書，封面設計當然還是由女兒春子操刀。然而最讓岱樺開心的還是來自讀者的肯定與多方迴響。清湯掛麵加黑框眼鏡，說話誠懇中帶著熱情的她，在訪談中場搜尋網路許久只為找出一張照片，讓我看看臺南一間民宿以《鄉間》封面進行空間藝術的再創作。岱樺笑言：「農業會把很多奇怪的人湊在一起」，「在鄉間小路上你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這些人都有自己生活的態度，有自己說話與理解農業的方式。」她也認為《鄉間》的半官方背景提供一個相對開放的空間（「就像農民市集，也是主流旁邊的另類空間」），為高度競爭的雜誌業界保留一個「不那麼商業的基地。」誠如岱樺所言，《鄉間》利用了農政體系既有資源而踏出體制；然而這樣的跨界也回頭拓展了體制原本既定的視野：

「總編跟我說她沒有想過《鄉間小路》後來會走到這個路線，因為它真的很『農』。她後來才發現，『農』原來可以注入這麼多活力在裡頭。」

從認為《鄉間》「真的很『農』」到發現「『農』原來可以注入這麼多活力在裡頭」，鄉村小路總編輯的體會真切地點出了「農譯」的重要。農政領域的工作者或許從1990年代就已經在種種政策性文件中讀過「後生產」、「農業多功能」與「新農體制」，但卻是藉由非農部門行動者在實作上構連了農與非農部門活潑且多樣化的關係，才真切體會了當代農意識的豐富生命。反過來說，多數藝文界農譯行動者的日常生活與農業、農民、農村多半有些距離，他們的專業訓練與既有的農業、農推、農政領域也毫無關係；岱樺的背景是傳播，春子是美術，但也因此他們比科班出身的農推從業人員更懂得如何將農轉譯為城市中產消費者偏好的文字與視覺形式，以及該藉由哪些管道擴大《鄉間》的讀者群。

《鄉間小路》的例子清楚說明一個傳統的「農業推廣產業」如何大膽走出既有體制，透過藝文工作者的媒介而在百花齊放的新農實踐中乘浪而起。這絕非特例。近年許多設計、影像、美術、建築、空間規畫、廣告、傳播……等不同領域的創意工作者，紛紛跨足農產品、農文化、農意識的詮釋與推廣，走上了當年岱樺、春子與藝文界朋友們共同走過的「鄉間小路」。這與臺灣近年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密不可分：臺灣技職體系於1990年代大量改制升等，同時成立大量設計相關院系，每年有數千名設計專業畢業生投入相關職場，也同時為相關市場累積一批品味接近的「消費—生產者」(user-producer)。文創產業入法後，公部門資源又制度性地投入農產品的形象設計、產品識別與包裝(re-branding)等工作，⁶⁸也由此推動相關「農創」領域的產業化。換言之，我們必須將農創的興起，放在臺灣近年「文化中介」領域的產業化與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過程來理解，而這背後更大的脈絡則是全球化情境之下與跨國資本主義同時興起的「地方」、「文化」、「倫理」與「美學」轉向。社會學者指出，在資本主義全球化造成的集體異化中，曾經作為現代性指標的個人主義遭逢瓶頸，各種超越個人界限的小眾認同代之而起，具現為種種對美學與文化社群的消費性渴望。人文地理學者則認為這見證了全球都市在追求生活與環境品質的縉紳化(gentrification)過程中，以「文化」、「美學」、

68 此處感謝黃威融(2013/11/07)與朱逸恆(2013/12/11)分享他們長年觀察的心得。

「創意」等秀異符號形塑地方認同的「象徵經濟」的崛起。⁶⁹不可否認，生態友善型耕作及其所強調的人、地、物關係的重新社會化，確實為象徵經濟提供豐富的差異化條件：生態型農耕的友善環境特質，賦予相關產品「照顧環境」的倫理正當性。小農生產的精耕細作特質，提供第三方認證制度做不到的個人化「品質」保證。產地直送與產地地消的理念實踐，同時也是建構「地方感」的重要憑依；而當季當令的限量生產，又正與精品市場的限量行銷若合符節。⁷⁰換言之，即便新農行動者努力重建產銷過程中較為綿密的社會關係，她們卻無法阻斷其他行動者挪用或再次賦予這些社會關係其他（包括商品化在內）的意義。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所言，意義的生產是涉及社會差異的象徵鬥爭場域。⁷¹任何農譯實踐在參與發展多元農意識的同時，也同時參與了這些意識之間的象徵鬥爭。尤其當人人都可能成為協同生產者，「文化中介」也就可能出現在產銷過程中的任何環節。新農江湖除了代表異類共生，也代表多元農意識之間更為開放而激烈的象徵鬥爭。⁷²

（四）生產端的農譯 / 藝復興

1. 與螺共生的友善小農技藝

新農江湖除了異類共生，也代表多元農意識之間更開放而激烈的競爭。此一既競爭又共生的關係，也發生在農藝復興的生產端。1979年，原生於阿根廷的Pomacea canal iculata (golden apple snail, 福壽螺, 金寶螺) 首度被引進臺灣，當時沒有人知道牠即將徹底改變臺灣的水稻生態。⁷³福壽螺喜食植物嫩株、乾濕兩棲的生物特性，與臺灣甫經綠色革命改造後機械插秧、密集條植的水稻人工濕地高度契合。福壽螺也因此成為亞洲各國稻農與其他水生

69 參見張君玫(2012: 217-8)與Zukin(1995)。

70 感謝鄭安齊最早提醒我這些想法。關於地方特色如何成為差異化的壟斷地租，見David Harvey對法國酒莊產業的經典分析(2003)。關於設計產業與綠色縉紳化(green gentrification)，參見王志弘、李涵茹(2015)。Goodman(2004)早已指出，AAFNs中企圖重新「社會化」的產消關係不該只是停留於抽象意義下的消費「時刻」，如此的「社會性」自然是遠遠不足的。我們必須真正關切並追求對一切權力的關係性理解，這才是「社會」。

71 參見Bourdieu(1984)。

72 我們可由此角度理解近年漸形白熱化的「鬼王PK文青」、「農企業v.s.小農」論辯。

73 福壽螺是在1970年末期同時被引進中國、臺灣與菲律賓，數年之內即已蔓延全亞洲。關於福壽螺在亞洲的傳播歷史，可參見Cazzaniga(2006)對福壽螺在亞洲與原產地的生態特性比較。

作物產業的夢魘，尤其對機械插秧一個月以內的秧苗形成極大威脅。工業型農業的對治手段是在插秧時一併施放除螺藥（與除草劑），這些藥殺螺的同時也毒殺了田中多數的生物。換言之，福壽螺的食性固然對水稻產量造成威脅，但更深遠的影響還在於除螺藥對水田生態的廣效性破壞，同時也使水稻農陷入對農藥與化肥更深的依賴。

臺灣的有機認證制度以苦茶粕(*camilla seedcake*)為標準福壽螺生物防治劑，然而苦茶粕溶出的皂鹼對於原生種螺（例如皆屬腐食性而對秧苗無害的田螺與網蝸）、蛙類、昆蟲、魚蝦等同樣有廣效性的殺傷力。也因此，若想盡力實踐友善耕作「不傷害對作物無害生命」的理念，農人就必須想辦法在工業型農業與認證式有機的除螺法以外另闢蹊徑。如何「友善除螺」於是成為友善小農獨有的問題意識，也是友善小農以實際行動轉譯友善耕作生態優位價值的一大挑戰。

部分友善小農採取了鑑別度最高的除螺法：徒手撿螺。具體作法是在早春翻耕以後（可挖出一部分土中越冬的福壽螺），以米糠或茶葉集中誘捕。插秧以後則利用福壽螺的嗜水性，在秧苗最脆弱的前三天放乾所有田間水，三天之後則採低水位讓田水泌流而過但不積水，以降低福壽螺的活動力與洄游範圍。這麼做可能衍生兩個問題：第一，由於水稻生長本身也需要水，停水可能造成水稻生長緩慢，尤其寒流來襲時的夜晚，更需要以大量水體保護秧苗避免受寒。⁷⁴第二，停水的田土容易滋生雜草，尤其當氣溫漸次回暖，兩日春陽後雜草可能就快速蔓延，成為田間管理者的另一場夢魘。換言之，「手工除螺」考量的不單純只是農人、螺與秧苗三者間的關係，還包括此三者與雜草、氣溫、水位、日照等因素之間錯綜連橫的動態。然而理解這多面向的關係性網絡也正是生態型水稻農耕技藝的起點：一旦跳脫以農藥與化肥操控作物生長環境的工業型農業範式，農人就必須仔細留意每一塊田區獨一無二的環境條件，以及田中生物們的族群數量與生物特性，因為物種與物種、物種與環境之間的動態關係隨時都影響著水稻的生長態勢。生態型農技藝正是取決於農人如何根據觀察的結果，選擇性而且策略性地介入水田裡的「物種—環境」關係網絡。

74 尤其是臺中秈十號秧苗，因其需肥量少、產量穩定的特色成為宜蘭友善耕作小農最常選種的稻種，但其耐寒力也最差。

在當前宜蘭水稻生態網絡中，一個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殘酷現實是：福壽螺是永遠除不完的。根據調查研究，宜蘭由於天候與常態性休耕的綜合因素，一分地裡的福壽螺數量平均高達兩萬兩千隻，應屬全臺之冠。⁷⁵撿螺因此是一個注定失敗的任務(built-in failure)，真正目的不在於除光殺光，而是幫助秧苗撐過插秧一個月內最脆弱的時期。這是為什麼每年3、4月宜蘭友善小農的田間總是反覆上演著「撿螺」、「補秧」、「捺草」的春耕勞動三部曲：福壽螺被農人撿了又生、生了再撿；秧苗被福壽螺吃了再補、補了再吃；而田間其他的水生草類則在每一次停水放水的間隙中以驚人的速度捺了再長、長了再捺。如此來回搬演近一個多月的秧苗保衛大戰，直到秧苗纖維粗壯至福壽螺啃不動的韌度，農人才放心提高田區水位鼓勵福壽螺啃食雜草。在接受螺草與水稻共存的前提下，友善小農進一步積極利用福壽螺與雜草和「水」之間的不同關係（前者愛水、後者畏水），再加上農人移除福壽螺而留下原生種石田螺與網蝥的選擇性勞動，嘗試在還是以單一種植為原則的水田中，創造一個保持多物種動態平衡關係的人工溼地生態系——在其中，福壽螺不再只是貪吃無厭的「害蟲」，而是幫助農人除草的工作動物；「稗草」也不再只是失控蔓生的「雜草」，而可以替代水稻成為福壽螺的食物。可以說，宜蘭友善稻作小農技藝的核心，正在於創造一個多物種異類聚合體，讓田土水平、水位、氣溫、福壽螺、稗草、水稻等田間生物與非生物各自發揮其物理與生物特性，而與遠方的消費者共同成為農人的協同工作者。

2. 當我們螺在一起

值得強調的是，除了田間生物與非生物的協同參與，以上「與螺共生」的友善水稻農法部分也來自友善小農社群長期的觀察、試誤，與集體積累。2015年春耕，一系列以福壽螺為主軸的田間觀察與自主實驗在社群中不約而同地展開。有人將福壽螺卵撿回家泡水28天，觀察是否可以防止螺卵孵化；有人腿傷卻不休息，反而自行研發站在田埂上就可以遠距撿螺的工具（羅傑農場）；有人聽說夜間捕螺效果好，於是開始每天半夜帶著頭燈下田撿螺（阿爸的米、土拉客）。從「農民食堂」的大木桌到臉書上的「兩佰甲」核心志工群組，從相互支援的田間共同工作時刻到巡田水時路邊偶遇的幾句閒聊，種種縈繞友善耕作稻農心頭的人螺互動心得與愛恨情仇，就在這些或制度或隨機的

75 休耕補助實施以來宜蘭稻農每年只種一期水稻，造成多數水田每年有長達半年的蓄水期，提供福壽螺絕佳的越冬與繁殖環境。

場域裡流傳，集體累積為一系列以福壽螺為主軸的水田生態在地知識。2016年春耕，半夜撿螺已經成為標準操作原則，遠距撿螺的「撿螺神器」則在更多人的複製與研發下功能倍增，某個版本甚至多了手臂支架（波波的米）。還有人研發三杯螺肉、鹹酥炸螺卵，與川燙螺肉貓食（土拉客），意外廣獲好評的螺肉滋味且在農民食堂中即席引發一場「螺稻共生」是否影響福壽螺肉質Q彈度的討論。而就在這夜以繼日、日復一日的撿螺賣螺、煮螺吃螺、觀察討論、同仇敵愾、模仿戲謔，與天馬行空的過程中，忙碌的春耕不知不覺也已過了大半。再一次，福壽螺週期性地統一了鬆散的員山友善小農江湖。

以福壽螺為核心的友善小農集體農藝創新，還包括了科學家與在地老農的關鍵性參與。2013年，本為鳥類與兩棲爬蟲類生態專家的林芳儀與陳毅翰（友善米）夫婦加入倆佰甲務農，和時年兩歲的女兒搬來深溝。不用苦茶粕的農法選擇，使芳儀與毅翰跨進了友善小農江湖的人螺跨物種關係叢結；不在學界謀職的生涯選擇，則給予他們更寬廣的學術空間。有別於日漸以發表點數、專利技轉為主要考量的學院趨勢，兩人投入與水稻農最切身的福壽螺基礎研究，近兩年並號召新農共同參與計數與測量工作。這項「農田裡的科學」(Science in the Field)計畫證實了幾項原本只靠口耳相傳與臉書貼文在友善新農界流傳的田間觀察：福壽螺夜間活躍程度更勝於白天、在四周田埂邊的數量更勝於田中央，然後還挑食愛吃香蕉和米糠。⁷⁶兩人又據此進一步設計出以簡易自製陷阱搭配誘餌的系統性捕螺法，方便農民以更低的人力與物質成本有效減少福壽螺群數量。

「稻田裡的科學」計畫的重要性不只在於它契合目前熱門的「公民科學」與「參與式」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芳儀與毅翰在邀請農民「參與」學術性研究之前，自己先成為新農在耕作與社群生活上的同儕，也在與農民最貼近的勞動節奏與物質條件下進行展開研究。他們的實驗因此必須配合水稻的耕作時序與新農的勞動節奏。⁷⁷他們推薦農民以米糠誘螺，而不是以實驗室

76 2013秋到2014年夏，青松帶領一群老中青三代混齡的友善小農研讀日本農文協出版社的《水稻栽培的基礎》，亦有藉著對日參照而建構本土友善耕作水稻栽培知識體系的意味。當時的困境在於，難以超越「臺灣在地經驗」與「日本科學知識」的差異性框架。2015年芳儀與毅翰的系統性地實驗，則有效地橋接了此二不同知識體系。

77 例如2015年秋季因農民太累而修改實驗計畫，2016年春耕又因天冷延緩福壽螺活躍時間而延後陷阱測試計畫。

結果最好的香蕉誘螺，因為米糠是水稻農最經濟可得的資材。於是，相較於楊弘任曾經指出的、農改場專家與農民師傅之間既區隔又緊密連結的「準師徒關係」，⁷⁸員山友善新農社群的補螺技藝創新則源於農民與專家、田野觀察與實驗法則、實作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更為靈活的相互轉譯，以及在轉譯過程中雙向發生的「創造性轉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當譯者在不同知識類型間進行比較與轉譯時，他們既突顯也改變了既定語言與自己的視界，也因此對他者與自己同時進行了轉化與譯變工作(transmutation)。翻譯於是成爲一個雙向轉化的過程，同時涉及對他者的翻譯與自我的再造⁷⁹：科學家學習成爲農民，農民也學習成爲科學家。而且，農民透過學習成爲科學家而成爲新的農民，科學家也透過學習成爲農民而成爲不一樣的科學家。以芳儀與毅翰爲代表的倆佰甲新農社群，肉身具現了當代農藝復興中「農」與「非農」部門之間更為緊密而動態的新邊界。⁸⁰

3. 「互動做有機」

社群邊界的協商與內在意涵的相互轉化，同樣發生在深溝村的「新農」與「老農」之間。2014年早春某日，我的手機彼方傳來青松興奮的聲音：當天早上陳老主委在自己的水田一角整出一方秧蓆(ng-tsioh / 秧床)，準備開始手工育苗了。由於水稻種植的產業鏈分工細密，水稻育苗早已是育苗場的工作，一般是由負責插秧的代耕業者自己育，或者跟固定的合作育苗場叫苗。負責田間管理工作的友善耕作小農即便從插秧前一個月就開始農忙，卻也得等到插秧當日才看得到自己的秧苗。⁸¹相對地，手工育苗則代表著從種源、育苗、

78 參見楊弘任(2014[2007])。

79 creative-transformation，參見張君玫(2012)。transmutation，參見Henk and Severi (2014)近來(引用Jacobson)從翻譯理論對民族誌多元本體論的思考。這也呼應Shiho Sastuka(2015)以加拿大跨文化觀光民族誌爲脈絡觀察的後殖民科學實踐。

80 一位具資工背景的小農陳幸延，於2016年開始以回收與簡易材料實踐他心目中的「適切農技」，其中包括一臺以一塊電路板與幾條傳輸線製成的監測儀，可同時測量田間濕度、溫度、水溫、土溫並且即時上傳網路。2016年3月底，最後一波寒流來襲的午夜，我發現至少還有另外五個人守在網路上，和我一起關注這臺儀器所紀錄的溫濕度起伏。

81 1960年間，臺灣糧農政策目標由自給自足轉向產業化，亦即追求農產品產銷過程的分工、專業與規模化，促使規模化經營的稻米代耕業者(機工包工農)興起，而與不具有生產設備、負責平日田間管理、其餘農事由機工包工農代耕的小農地主形成相互依賴又有張力的雙元並存關係。友善稻作新農加入此一雙元結構，因此她們與慣行代耕業者之間是密不可分的合作者，而非如一般AAFNs所標榜的「另類」網絡。見Lo and Chen(2011)，吳紹文與蔡晏霖(2015)。

插秧都脫離了機器包工的產業鏈系統，等於農人從育苗業者處拿回秧苗的完整主控權。電話中，青松自陳最高興的是陳老主委並沒有跟任何新農商量就自己開始育苗，這顯示陳老主委知道新農群聚的深溝村有年輕人在看、也一定有年輕青人會跟進學習。儘管這個苗床在數週後就因為鳥害而停止運作，但它依然展現了陳老主委自發性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復古做有機」的決心。

一年後我有機會請教陳老主委2014年自力育苗的動機，才知道主委阿伯的育苗實驗還有另一層更為切身的考量。一位委請他代耕的青年地主，堅持不用苦茶粕而要用手撿螺，這才促使老主委開始思考：不用苦茶粕固然友善環境，但手撿螺需要長達一個月、高強度的勞動力投入，這對於人力短缺的農村確實是個問題。那麼究竟有沒有什麼方法是可以既友善環境、又減省勞動力呢？陳老主委的答案正是手工育苗。⁸²手工育苗是在稻田中隔出秧蓆，稻穀浸種發芽後直接撒種於秧蓆，待秧苗30日大以後再以手工移植插秧，插秧期可長達45天。相較於秧苗只20日大就插秧的機械化操作，手工育苗在秧蓆製作與手工插秧兩個時點需要大量人手；好處則是可以自主留種與選種、確保育苗過程不施藥，而且可以等秧苗較為成熟以後插秧，降低秧苗對於福壽螺的吸引力。這同樣是利用秧苗與福壽螺的生物特性而達致的協同生產，透過延遲秧苗移植進入田中的時機提高秧苗的生存率，再間接減少手撿螺的勞動投入。在2015年春耕的第二度手工育苗實驗中，陳老主委和四組青年新農（有田有米、樂生米、田文社、見學之米）一起做秧蓆，結果不僅成功供應近兩甲手工田所需的秧苗，而且後續有效節省約一半的撿螺時間與人力。

總之，無論是為了技藝傳承，或是為了減少手撿螺的勞動量，陳老主委的自主手工育苗實驗確實萌發自他與新農的長期互動。主委阿伯說這叫「互動做有機」，形容自己在與友善小農的互動中，「就像一本書被打開了」、「電腦的記憶體被找出來了」，從此隨時在腦中翻找「記憶中的有機」、思考什麼是可行的下一步。另一方面，新農們也一邊種稻、一邊逐年蹣跚地學習如何成為在地老農接受與認可的農人。2015年6月，全村靜待稻子孕穗的農閒時分，三官宮的後埤廣場舉辦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儀式；在陳老主委的支持下，30幾位友善小農們在此「集體拜田頭」，以排滿好幾個長桌的供品宴請附近田區與路過的「好兄弟老大公」。「田頭主」的祭拜原本隨田而定，然而外來新農輾

82 本節的引文，來自2014-16年間與陳榮昌先生的非正式訪談性質對話。

轉承租田地耕作，難以盡明手上田區的歷史與祭拜慣習。陳老主委於是召集眾家新農舉行集體儀式，將原本分屬個人田區的儀式集中作業統一承辦。而透過眾人集資的豐盛祭品與一束馨香，新農參與者也等於向三官大帝、各路神明、與各位地主與老農們正式承諾：從此友善小農不只在深溝承租水田，也將和此庄百年來的農人一樣，長此承擔起田區祭祀的責任。⁸³農耕勞動所產出與照顧的，從來就不只是價起價落的農作物，而是「田頭田尾」有形無形的生靈萬物——而這，正是宜蘭在地鄉庄社會土生土長的「農業多功能」論述。

四、結論：共生的必需與艱難

(一) 江湖

本文以「農義／農譯／農藝」為視角，探究過去十年「農」在臺灣社會由邊緣而中心、由鄉村到城市、由廉價變好價的變化——這是本文所稱的廣義的「農藝復興」(agricultural renaissance)。我特別關注，來自不同生活世界的異質行動者，如何在農藝術與農技藝領域、以論述或實作擴大農的當代意義與連結，此為狹義的農藝復興：在消費端，來自美術、設計、音樂、影像等不同領域的藝文工作者將農帶進城市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賦予農有別以往的美學、品質、文化，與倫理意涵。在生產端，為求田間生物多樣性而選擇不施藥淘螺的友善小農，以徒手撿螺搭配水位控制的在地農法，將農民與福壽螺的關係從對立性的「害彼害己」轉化為「減量共存」，甚至進一步創造協同生產的可能。尤其重要的是，友善耕作不只在本地論上追求物種相生的共存社群倫理，也是不同知識體系相互創譯的知識生產場域。它的農技藝是經由農人與田間生物、新農與新農、新農與老農、專家知識與經驗知識、科學知識與俗民信仰等不同主體與知識彼此參照啟發而來——它源自在地、根植於農人的田間觀察，卻又境遇性地融合社群討論、網路知識、科學文獻、俗民知識，以及傳統農村信仰。也因此，在此「互動」做有機的不只是一般理解下的技術體系，也包括深具文化意涵的宇宙觀與本體論；被轉譯的也不

83 這些「老大公好兄弟」往往是村民在開墾、造屋過程中發現的無名人骨或獸骨，根據在地口述，來源包括兩百年來因蘭陽溪頻繁氾濫的受難者，以及二戰末期美軍空襲的死難者。遺骸發現後往往移往鄰近的有應公廟祭祀，但該田區的耕作者依然每年在插秧前與收割後祭拜「田頭主」以祈願並感謝收成。

只是典型的知識客體，還關乎意志、心神、美感與勞動體驗的整體性感知。⁸⁴

關於臺灣當代新農浪潮，踐行者從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存有方式，肯定者認為是典範轉移的危機出路，懷疑者認為是保守反智的天真懷舊，批評者認為是華而不實的漂綠資本主義。本文則希望跳脫單一立場的侷限，以宜蘭友善耕作」社群為例說明新農浪潮跨界協力的本格外質性。「農藝復興」是由新農與老農、農民與非農民、人與非人、生物與非生物行動者共同形塑的當代現象。這些多元而異質的新農行動者一方面正以各自的生存之道嘗試在農村立足，一方面也在這個過程中改造了自己與農村，並且構築了「農」在當代臺灣社會的空間性、社會認同、與經濟可能。正是基於此，儘管我同意博蘭尼對於資本主義帶來商品化鉅變的深刻洞見，但我不認為新農浪潮可以被全稱性地理解為全面性商品化趨勢下某種大寫社會(Society)的自我保護。如果生命世界的全面商品化是資本主義的歷史效應，而且它的施為形式正是透過一個大寫市場及其虛擬的經濟法則來完成，那麼我們似乎不宜再召喚另一個巨靈式的大寫社會，而應該如博蘭尼建議從實質論的角度還原經濟活動與生命世界的多義性。就算我們可以在概念上想像一股匯湧成勢的集體社會動能（如同新農「浪潮」這個比喻企圖傳達的），但這股「浪潮」依然還是由無數小寫人與非人施為者的日常實踐積累而成，彼此可能理念相契也可能充滿張力，正如浪潮中進退來回、交錯拍打的各種浪花。

準此，本文提議將新農浪潮視為一個物種、論述、技術、與夢想交織且相互作用的「江湖／異質聚合體」：它指向一個既鬆散又連結的開放性場域（但不是開放無邊），由懷抱不同理念、動機、物質、與符號能力的人與非人行動者，在偶然與特定的脈絡下達致的廣義合作關係。⁸⁵就像人類學者Alison Leitch(2003)所研究的義大利慢食運動，本身固然有著完整的新左翼理論系譜，但也在慢食運動的推展上與極右的基本原教旨主義、以及遁入私人心靈世界的新世紀主義形成境遇性的合作關係。包括宜蘭友善耕作社群在內的臺灣新農江湖，確實也涵納了從左到右、從保守到激進、從開放到排外、從利己

84 我與三位研究合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將此稱為實驗自然史(experimental natural history)，強調水田中的福壽螺、農人、水鳥、水稻等各種參與者，都以覺察自然與實驗性質的實作而適應彼此，可參見Tsai et al.(forthcoming)。

85 所謂合作固然包括有意願或有意識的互通聲息或協同工作，但也可能是在各說各話、同床異夢、甚至吵雜交鋒等情況下發生的「無共識的合作」。參見註65。

到利他、從投機主義到理想主義……等光譜殊異的組成元素。最重要的是，我無意指出新農社群即便意見不同也你儂我儂。相反地我希望強調：跨界連結、多元異質、眾聲喧嘩「正是」新農社群的運作模式。一個簡單而清楚的事實是：如果不是各種有理念、沒理念、不同理念的人與非人，在不同領域以不同方法各懷鬼胎地、前仆後繼、各顯神通地投入，新農浪潮在臺灣絕對不會在短短幾年內就具有如此豐沛而引人注目的聲勢與力道。也因此，無論是立意良善的純化努力，或者紮稻草人式的簡化攻擊，很可能都錯失了新農浪潮的核心動能：開放源碼、志願社群、多元協作、駁雜不純，以及摸著石頭過河的任務型(ad hoc)隨境組裝(bricolage)。這些既是新農社群相較於標準化生產模式的「缺點」，但也正是它的方法論與創新資產。它難以上行下效，但也因此得以廣納百川；它無法給出任何權威性的「認證」，因為它本身就是以去中心、反權威的方式運作。這樣的「烏合之眾」注定不完美，然而如果我們強調「農」在生態與歷史、科學與文化、物質與風格、個人心靈與集體歸屬上的多功能，我們就需要更多不一樣的人與非人來踐行並不斷開展農的更多可能。

進一步以學術社群期待的語言闡述(也是一種農譯)，本文承襲女性主義科技研究(feminist technoscience studies)的洞見，尤其人類學者Anna Tsing(2015)的理論概念，視前述多元異質的臺灣新農浪潮為「不同生存之道的開放性纏聚」(open-ended entanglement of ways of being)，其中參與纏聚的行動者不只包含農民與作物、社群與技術、人與非人，也涵括實作知識、科學知識、俗民知識等不同理解世界的框架(world-making projects)。以下容我冒著言語艱澀疏離農友的風險，就幾個重點稍加闡釋：

首先，在歐美人文社會理論的世界中，assemblage本身就指向一個高度異質的理論叢聚，其中兩種代表性的理路分別來自人類學者Aihwa Ong與Stephan Collier(2005)的全球組裝(global assemblage)，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STS)領域學者拉圖(Bruno Latour)拆解大寫「社會」的努力(2007)。前者的用法接近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征服時空、穿透一切的「論述」，後者則承襲德勒(Gilles Deleuze, 1925-1995)對「社會」的功能或本質性想像的解放，轉而強調應重視由人與非人行動者組成的一系列關係性行動「網絡」。Tsing與拉圖的對話關係顯然多於與Ong；然而相較於STS將非人類行動者的行動能力，概念上限縮為需經人為介入、協調、妥協之後才能轉換事物意義的中介

物，⁸⁶Tsing等人嘗試允許更多的人、非人、與「生存之道」參與纏繞，同時也賦予她們更大的擾動可能。這是認可非人行動者生命本質上的高度敏適性(agility)，才能在人類造成的生態與社會性荒原中存活至今。可以說，Tsing嘗試以理論本身的開放與不穩定性回應當代生存經驗中日漸普遍的不可定性(precairity)，藉此強調瀕危年代中人與非人共同求生的現實與倫理性義務。⁸⁷回到臺灣新農浪潮的脈絡再做說明：主流媒體常言返鄉新農從上班族生活「出走」與「逃逸」，然而我始終認為，跟隨資本主義的利益迴路跨國投資才是真正的「出走」與「逃逸」；相較之下，選擇和老農、小學生、水田、福壽螺、白鷺鷥、田頭主一起在城鄉不均發展的廢墟上生活與耕作，其實更像是從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生態、勞動、與社會性廢墟移往另一個廢墟求生存的努力。上班族因外食而三高的身體、農民因農藥而洗腎的身體、菜園因過度施肥而酸化的土壤、只剩福壽螺的水圳，外國農產品進口後長期休耕的農地……都是跨國工業型農食體系造成的生態廢墟；低薪過勞的都市窮忙族、年年面臨廢校威脅的小學、後繼無人的在地工藝、以外籍移民勞動力支撐的家庭再生產、田中央無人居住的「豪宅農舍」……則是臺灣出口代工發展模式創造的勞動與社會性廢墟。然而當福壽螺遇見窮忙青年、當棄業上班族來到偏鄉小學，上班族開始將老農種的菜送進小學生的營養午餐桌，校長也邀請老農與青年帶領學生學習以友善環境的農法種稻，過程並由具文字專長的新農記錄成書出版(小間書菜、有田有米、羅傑農場、小鵝米、土拉客、回家生活)。友善耕作社群中，各種人與非人的「倖存者」透過農技藝與農文藝的實踐，一起將廢墟轉譯為雖不理想但可茲生存的「庇護所」——而共生，正是這些異質聚合體的集體求生之道。

不過與其採用拗口又不在中文語境裡的「組裝」、「聚合體」或「交引纏繞」，本文直接將此「開放的多物種群聚」稱為「江湖」。⁸⁸江湖原本就是

86 參見林文源(2010)。

87 在絕大多數強調個體、逐利、競爭的慣行社會理論範式之外，Tsing努力在其理論視野中保留察覺(noticing)共生的可能性，本身即是一種對於建構共生世界的介入性實踐。關於學術工作從強調客觀性與情感距離的觀察與批判(critique)，到介入性的關切(concern)、欣賞(appreciation)與注意(noticing)的轉向，亦請參見Latour(2004)、Pols(2005)。此類可以體察、珍惜共生的理論性實踐同樣也在重新定義與打造學術工作與生活世界、實然與應然世界之間的共生關係。

88 本文對「轉譯」與「纏繞」的討論也參考臺灣本土的農業人文研究前例。我獲益於陳玠廷(2014)對於臺灣有機話語轉變的詳細考察，以及他以「交引纏繞」

象徵的也是物質的：在宜蘭員山友善小農社群的生活世界中，江湖是川流不息與生脈相連的溪、河、湧泉、埤塘、溝渠、水圳與田土，包含水田的自然與歷史環境，以及其中種種的生物與非生物。友善小農撿福壽螺、撿不完的螺吃秧苗、但也成為田中水鳥、水蛭、田鼠的食物，而這些螺與吃螺生物的排泄物又與百年來河水沖刷埋骨此地的「田頭田尾老大公」們一起成為水稻生養的有機質來源，並透過友善小農與代耕體系的產銷勞動進入城鄉串連的米食產銷鏈。一塊水田正是「不同生存之道的開放性纏聚」，是田中生物與農人共耕、共食、甚至「互食」所形成的多物種聚合體。

新農浪潮是一個高度個體化、強調個人品牌的經濟場域，這是每一位想從既有產銷體系突圍的農民無可迴避的現實。然而本文想強調，每一位新農「自我成就」的能動力，事實上來自新農與生產環境中各個關係者的「共同施為」。正如女性主義物理學家Karen Barad 強調：「『個體』不是不存在」，只是這個存在身不由己(not individually determinate)。……所謂的「能動性」來自施為(enactment)，而非某人所擁有、或某種以「個人主體」形式被具體化的某種東西。」(2012: 77)宜蘭友善耕作社群的農人，也是在與水田生物以及與地主、老農、代耕業者、臨田農人、其他新農的長期觀察、彼此學習、集體試誤、相互改變的「內動」(intra-action)過程中才逐漸成為「新農」。返鄉務農絕非歸隱田園，因為返鄉者一腳踏入的是不斷朝向更多她／牠／祂／它者 連結且延伸的江湖。這不僅是因為農村人際關係綿密或水稻生產鏈的層層分工，而更是因為「農」原本就座落於複雜的「自然－人文－政經」關係叢結中。2015 年初，宜蘭縣政府宣佈將實質管制豪華農舍，當時甫上任農業處處長的友善新農楊文全（倆佰甲）成為政策的第一線執行者。「農舍管制」於是

(entanglement)說明臺灣有機農業發展過程中，隨著相關制度法規的發展，不同行動者亦隨之做出差異性的詮釋，從而形成一個構築臺灣有機農業的異質性行動網絡，其中包括了農藥、檢驗技術等非人行動者。我也獲益於楊弘任所闡述的「雙向文化轉譯」，他以此說明農學專家與農民師傅各自本於「外來專業」與「在地實作」的不同知識形式，卻能互相「以自己語言說出對方興趣」(2014[2007]: 15-6)。不過誠如「一個友善、各自表述」現象所揭示，當代新農浪潮往往涉及更為寬廣的文化轉譯，除了「以自己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也時常「以對方的語言說出自己的興趣」，換言之有意識地挪用甚至誤用對方的語言。此外許多文化轉譯是無意圖的結果，從而比「以○○語言說出XX興趣」具有更多偶成與不可定性。這不代表我認為所有的行為都是「農譯」，而只是不在理論概念上先行預設與排除什麼樣的行為是或者不是「農譯」。

很快被既得利益者操作為新農與老農、縣政府與縣農會之間的對立性議題。⁸⁹下半年，新農吳紹文（土拉客）代表綠黨參選宜蘭縣立委，提出「農地農用」必須同時考量老農退休與農工不均發展的轉型正義。透過公辦政見發表會與各項競選活動，代耕業者、老農地主、友善新農、仲介業者，與公民團體由此展開更多檯面上下的對話。歷史、偶然，與結構位置的差異形成不同的生活世界，這些生活世界又在緊密相連的生存情境中與他者相遇、連結、交感、摩擦：是在這個偶成而不穩定、既命定又開放的江湖中，多元而異質的行動者集體但不同調地持續構築「農」在臺灣當代的可能意涵，以論述、對話、與實作不斷開展「什麼是農業？」、「誰可以稱為農民？」、「什麼是合理的產銷中介？」、「農地應否與如何農用？」、「如何打造新時代農村？」的社會對話。透過以身踐行「農」的複雜與多元可能，他們挑戰了城市的優越性，並藉此重新政治化工業資本主義長久以來在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之間造成的簡化與對立，以及總是要求後者成就前者的「犧牲體系」。（高橋哲哉 2014）我認為，以上種種對「農」的重新想像，以及藉由「農」解放並重新論辯「自然—人—社會」的合宜關係，正是當代新農運動最關鍵的時代任務。

（二）文化中介與農譯政治

必須清楚說明的是，關切新農浪潮中多元異質、合而不同的共生關係，並非為了期待任何「幫助小農」的溫馨故事或迅速印證「農村交工」的文化腳本，而是為了進一步思考：說來容易做時難的「跨界」究竟如何發生？如何在成就社群的同時，也同時成就其中各方異質主體的自我認同與差異？尤其重要的是，如何不以另一套犧牲體系取代原有的犧牲體系，而是讓「鄉」與「城」透過「承認彼此」的互動而走出一條突破當代生活集體困境的共生之途？

本文嘗試提出的切入點，是仔細觀察不同參與者之間的翻譯／中介行為，及其背後的文化政治與權力施為。如同第三節曾論及的，有別於傳統農業產銷鏈裡的層層中介，新農浪潮一方面追求中介層級的減少，一方面見證各種「文化中介／農創產業」的崛起，部分具有高文化資本的新農則同時成為自己農產品的直銷者與文化中介者。面對新農浪潮中百花齊放的意義生產，我們應該認真檢視它們的實作過程與權力效應：當人人都可能成為「協同生產者」，他們

89 宜蘭縣府自2015年起實質審查農舍起造人之農民資格、起造必要性，與十分之九面積維持農用等法定要件。農委會雖部分跟進，但利益團體施壓不斷，縣府立場也轉為搖擺。此案的長期成效值得繼續觀察。

之間的權力關係為何？在鏗鏘有力的「倫理消費」與「協同生產」論述背後，那些「被協同」的生產者，究竟在生產資源與交換條件上掌握多少主導權？當愈來愈多「協同生產者」進一步往生產端移動而投身農業生產最前線，他們如何協商或挑戰農村既有的權力結構？而新農社群內部的權力結構又是什麼？

對於權力關係的追問將帶我們更深入「共生」想像的本質。就像友善耕作小農撿螺也殺螺、種稻也除草，共生永遠是護生與讓死的選擇，也因此必然涉及傅柯所言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共生往往被輕易說出，但是共生的實作——那些願意以及努力深入彼此生命現場的轉譯勞動往往才是最艱難的，因為它們既在個人的生命史裡變動，也在一個家庭和群體的歷史中變動，更在關係和決策組成的當下變動。汲汲追問「中介」的故事及其權力關係正是為了盡可能地身陷與深陷其中，避免在太快嘗試克服的過程中架空了關係的艱困與黏著。

最後，對農譯的關切，還有助於我們思考臺灣農政的核心困境。人類學者黃樹民(2013)在對臺灣有機農業發展的回顧性評論中指出：臺灣的有機農業乃由上往下的橫向移植，不曾回應臺灣農業耕地零碎、人力缺乏而以家庭農場小農精耕為主的在地特色，也因此不僅無法解決臺灣農業整體的困境，反而造成有機農業本身的發展困局。黃氏的觀察有力地指出臺灣農政學界長期忽略本地現實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事實上，臺灣農政學界不是只在有機農業的引介上才橫向移植；臺灣農業最長遠且持續的「橫向移植」，正是視標準化、規模化、工業化、（以及最近熱門的）農企化為唯一可行農業模式的意識形態。⁹⁰是在這樣的根本迷思下，臺灣農政單位始終視臺灣的小農體制與家庭農場為「問題」。也因此雖然從1990年代中期就陸續引進歐盟與日韓的「農業多功能」、「三生農業」等「新農業體制」論述，但實質預算結構依然朝生產至上的工業型農業高度傾斜，包括持續補貼化學肥料與農藥產業。可以說，臺灣的農食法規與相關管理辦法，

90 比較性地說，占臺灣生產單位多數的小規模家庭農場既無「美洲粗放型企業農」的規模經濟，也欠缺「歐洲家庭農場」的高度政策性支持，也失去如部分臺灣原住民與東南亞農民以「生計家園」抵抗「跨國集團農耕市場」霸權的可能。而且重要的是，此一臺灣農業現實正好就是與「美洲粗放型企業農的規模經濟」以及「高度政策性支持的歐洲家庭農場」，一起在一個高度複雜且相互連結的國際糧農體制中逐步共同成型並相互深化的。關於臺灣家庭農場與新農運動的近期觀察與策略思考，請參見吳紹文、蔡晏霖(2016)。

幾乎都是獨尊一套規模化生產思維，也因而欠缺對在地「小生產者」模式與農鄉文化的肯認，當然也就不可能如鼓勵規模經濟生產者般地以具體的配套措施認可生態型小生產者在提高生態與文化多樣性、在地能源與糧食自給、個人與社群生計自主、在地與社群認同上無可取代的獨特價值。⁹¹

進一步思考，臺灣農業政策的「橫向移植」問題，正好反應了後殖民翻譯研究學者劉禾所稱的「等值的喻說」(tropes of equivalence, 1995)，亦即假定不同語言或文化之間具有對等的共量性，因此認為A語言中的X概念全然等同於B語言中的Y概念的喻說。然而事實上，無論在organic與有機、satoyama與里山、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與社群支持農業、或者在臺灣的家庭農場與歐盟的家庭農場之間，從來不存在單純而透明的「移植」，因為所有概念的跨界移動必然都涉及文化的翻譯與轉造。換言之，「等值的喻說」忽略「翻譯」本身在跨文化或跨語際溝通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是翻譯對於X與Y、以及對A、B語言同時造成的影響。從這個視角來看，有機農業或其他相關政策在臺灣的難以推展，不只是因為譯介者忽略了臺灣家庭農場與小農精耕的社會現實，也同時因為我們忽略在「移植」過程中，那些不假思索、毫無滯礙的「翻譯與轉造」過程，從而將原本立意補正工業型生產思維缺失的生態型農業實踐，在翻譯的過程中又轉造為工業型農業的延伸。第三節第二小節中所提，政府於2007年間將民間多元發展的「民間有機」，窄化為需符合「有機農產品」管理辦法的「制度化有機」，從而排除了許多如陳主委般具備「復古做有機」能力的家庭式小農的例子，特別值得深思。

正面來看，如果想跳脫臺灣農政「橫向移植」因而在政策與現實之間不斷落差的困境，我們就該更審慎地看待「農譯」的中介性與政治性。而這必然得來自我們對臺灣特定的「後殖民後工業農業情境」的持續反思，以及努力釐清貫穿其中的優位意符(如憲法146條明定應促成「農業工業化」)，及其往來普世論述與在地演繹間的知識／權力軌跡。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學習創造更好的農譯，學習如何在一個與臺灣之外共通的環境關懷與連帶感中，結合在地的環境歷史、精神信仰、農業社會史、政經結構、族群關係等條

91 也是基於此，我認為官方有機運動的橫向移植與進展停滯，不能抹煞民間實踐的蓬勃發展。事實上，如同我在這篇文章所舉例呈現的：臺灣廣義有機運動發展最為生猛有力的場域，正是在官方有機制度之外的友善耕作與相對應的食農網絡。而友善耕作倡議與實踐的小農耕作，也表現出對上述橫向移植問題的高度反省。

件，發展出獨特但又充滿連結可能的在地演繹與文化生產。⁹²源自於宜蘭的友善耕作小農論述，正是這樣一種在地轉譯的努力。

2015年五月，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宜蘭巡迴展來到三官宮進行露天放映，當晚適逢2015年的第一場颱風，風雨飄搖中來了70幾位觀眾，其中約有一半是新農，另一半是老少都有的在地居民。陳老主委環顧四周後對我說：「咱宮裡自己拜拜做歌仔戲都沒來這麼多人。」當晚放映兩部1950-60年代由農復會發行的宣導影片，內容分別教導農民如何正確使用化肥與農藥，主委阿伯卻在映後座談裡大談「友善小農」來了以後如何讓深溝農田水質逐漸變好。阿伯說，以往插秧後的田間溝渠是一片寂靜的春天，今年不到五月卻已經又現臺灣颯的蹤形。座談結束後，屏幕內外農知識典範的反差更加清晰：影片中1950年代的臺灣農村正要起步追求工業化農耕範式的規模與效率，甫自農校畢業的農會指導員身著西裝以表格與圖解教導農民如何理性使用現代化耕作技術；屏幕下2015年的宜蘭深溝村，一群友善新農團團簇擁著主委阿伯，只盼從老農豐沛的在地知識尋思友善農藝的精進之道。綠色革命與工業化農食體系滿足了大眾消費市場求快求量求便利的需求，但也長期貶抑臺灣農村的多元面貌與價值，除了造就當代農鄉的生態與社會性危機，也為城市帶來層出不窮的食安問題。追根究底，新農浪潮反應的是當代社會逐漸走出綠色革命的單一生產典範，轉而重新體察對「農」的多面向需求。然而「農」的多功能勢必得由不同型態的農業模式與從業者來共同成就。要達到這個目標，評論者首先必須跳脫非小即大、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才能思考何種綜合性的資源配置能讓更多不同條件的農民各展所長，也才能讓臺灣農鄉真正走出生態與社會的寂靜春天。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王志弘、李涵茹。2015。〈綠色縉紳化？台北都會區水岸住宅發展初探〉，《社會科學論叢》9卷2期，頁31-88。

王燕華。2003/07/29。〈齊淑英 高喊友善農業〉，《聯合報》B2版。

92 參見海瑟(2016[2014])。

- 江新燕。2010。《第一屆臺灣農學市集研討會》。新竹：竹蜻蜓綠市集。
- Alitto, Guy S. (艾愷) 著，王宗昱、冀建中譯。2013。《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光華新聞文化中心。2012。〈微光生活綠市集 Creative Green Market〉，收錄於《臺灣創意好事》。<http://www.taiwaninfo.org/2012/01market.htm>。(2013/10/29 瀏覽)。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主力農家經營概況調查報告》。臺北：行政院主計總處。
- 何榮幸、高有智。2005/07/10-13。〈「休耕啓示錄」專題系列一～六〉，《中國時報》第三版。
- 吳音寧。2007。《江湖在哪裡？》。臺北：印刻。
- 吳美雲總編。1996a。《漢聲雜誌第九十一期：有機報告(一)》。臺北：漢聲雜誌。
- 。1996b。《漢聲雜誌第九十二期：有機報告(貳)》。臺北：漢聲雜誌。
- 。1996c。《漢聲雜誌第九十三期：日本MOA的自然農法》。臺北：漢聲雜誌。
- 吳東傑。2006。《臺灣的有機農業》。臺北：遠足。
- 吳紹文、蔡晏霖。2015。〈想我代耕的兄弟們〉，《青芽兒》第六十九期，頁10-13。
- 。2016。〈從「家庭農場」看台灣新農運動的困境與突圍〉，《網氏/周市電子報》。<http://www.frontier.org.tw/bongchhi/archives/30948>。(2016/7/10 瀏覽)。
- 吳瑪俐。2015。《與社會交往的藝術——香港臺灣交流展》。臺北：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
- 呂宗芬、許政俊。2012/09/22。〈鳳梨農向總統建言，盼健全農業環境〉，《公視晚間新聞》。<http://goo.gl/dVqNI>。(2013/10/29 瀏覽)。
- 李丁讚。2010。〈重回土地：災難社會的重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七十八期，頁273-326。
- 。2011。〈公民農業與社會重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八十四期，頁431-46。
- 李坤建。2007/11/10。〈「士新·漂鳥」農莊實現樂活夢想〉，《中國時報》桃園苗房地產A22版。
- 李承嘉。2012。《農地與農村發展政策：新農業體制下的轉向》。臺北：五南。

- 李寶蓮。2004。《女農討山誌》。臺北：張老師。
- 汪文豪。2012。〈不當休耕補貼，讓熱血務農青年成爲崩世代憤青！〉，《上下游新聞網》。<http://www.newsmarket.com.tw/blog/19046/>。（2013/10/29 瀏覽）。
- Petrini, Carlo (佩屈尼) 著，林欣怡、陳裕鳳譯。2009。《慢食新世界》(*Slow Food Nation*)。臺北：商周。
- 周序樺。2013。〈有無相生：美國有機農業論述與農業倫理〉，收錄於《生態文學概論》，蔡振興主編，頁221-239。臺北：書林。
- 林文源。2010。〈轉變病患行動能力佈署：以臺灣透析病患團體爲例〉，《台灣社會學》第二十期，頁40-99。
- 林宗弘、洪敬舒、李建鴻、王兆慶、張烽益。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臺北：臺灣勞工陣線協會。
- 邱貴芬。2007。〈在地性論述的發展與全球空間〉，《思想》第六期，頁87-103。臺北：聯經。。
- 美濃愛鄉協進會。1994。《重返美濃》。臺中：晨星。
- Ploeg, Jan Douwe (范德普勒格) 著，潘璐、葉敬忠等譯。2013[2008]。《新小農階級：帝國和全球化時代爲了自主性和可持續性的鬥爭》(*The New Peasantries: Struggles for Aut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in Era of Empire and Globalization*)。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Heise, Ursula K. (海瑟·烏蘇拉) 著，陳佩甄譯。2016[2014]。〈「人類世」的比較生態批評〉(“Comparative Ecocriticism in the Anthropocene”)，收錄於《全球生態論述與另類想像》，頁233-251。臺中：中興大學。
- 莊雅仲、陳淑容。2016。〈中型城市發展與城鄉新連結〉，《文化研究》第二十二期，頁123-146。
- 張君政。2012。《後殖民的陰性情境: 語文、翻譯和欲望》。臺北：群學。
- 張柏東。2005/02/02。〈返鄉創業 陳保成榮獲神農獎〉，《聯合報》花蓮縣新聞C2版。
- 張瑾文。2015。〈有機產業與有機食尚〉，中央大學臺聯大「超越未來」課程課堂演講，2015/05/07。
- 郭志榮。2003。〈農業新文明〉。<http://ourisland.pts.org.tw/content/農業新文明#sthash.4zi35kPH.dpbs>。（2014/06/06 瀏覽）。
- 郭華仁。2012。〈有機農業的必然與實現〉，「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與有機臺灣」研討會。<http://seed.agron.ntu.edu.tw/organic/draft/org20120505.pdf>。（2014/06/06 瀏覽）。

- 高橋哲哉著，李依真譯。2014。《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臺北：聯經。
- 約翰之聲。2014/03/31。〈服貿惡果：大陸人狂買台灣土地，再放高利貸吸金〉，《商業周刊》。<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BlogArticle.aspx?id=6871>。(2015/05/06瀏覽)
- 陳玉華、洪依婷。2016/07/25。〈良食商機〉，《今週刊》第一〇二二期，頁62-82。
- 陳正喜。2003/09/29。〈農產品價廉，傑出農民吐苦水〉，《聯合報》中部新聞B2版。
- 陳玠廷。2014。《臺灣有機農業反身現代現象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博士論文，未出版。
- 陳信行。2016。《看見不潔之物：工業社會中知識權威的文化實作》。臺北：台社。
- 陳界良。2003/08/29。〈夏季蔬果價跌，農民苦〉，《中國時報》南投新聞C2版。
- 陳歆怡。2011。〈農民市集在地小農合作運動〉，《臺灣光華雜誌》第三十六卷九期，頁70-77。
- 陳瑞樺。2016。〈以農之名：臺灣戰後農運的歷史考察〉，《文化研究》第二十二期，頁75-122。
- 商業周刊編。2015a。〈臺灣366鄉炒地實錄〉（封面專題），《商業周刊》第一四三二期，頁104-133。
- 。2015b。〈為何全球年輕人都在瘋農業〉（封面專題），《商業周刊》第一四三四期，頁98-129。
- 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2011。〈【耕耘社】闢地種菜、填飽肚子〉，《青春·記憶·老臺大：臺大老照片的二十個故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頁108-115。
- 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主編。2010。《第一屆與臺灣農學市集研討會文集》。新竹：清華大學清華學院。
- 遠見編。2014。〈為何全球年輕人都在瘋農業〉（封面專題），《遠見》第三三一期，頁200-247。
- 趙泓。2014。《中國人的烏托邦之夢：新村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發展》。臺北：獨立作家。
- 彭明輝。2012。《臺灣糧食危機關鍵報告》。臺北：商周。

- airiti
- 黃樹民。2013。〈臺灣有機農業的發展及其限制：一個技術轉變簡史〉，《臺灣人類學刊》第十一期一卷，頁9-34。
- 楊弘任。2014[2007]。《社區如何動起來》（增訂版）。臺北：群學。
- 楊宇帆。2012。〈親愛的英九，聽我說說話，好嗎？〉，《鳳巢有機鳳梨》。
<http://why160why.pixnet.net/blog/post/92886201>。（2013/09/20 瀏覽）
- Williams, Raymond（威廉斯）著，韓子滿、劉戈、徐珊珊譯。2013[1975]。《鄉村與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北京：商務。
- 綠雜誌編輯室。2012。〈讓世界看見雲林：農業X設計，前進DMY柏林國際設計節〉，《綠雜誌》第十八期，頁26-45。
- 蔡佳珊。2015。〈充實你的菜籃和腦袋，來逛農民市集！〉，《經典雜誌》第二〇八期，頁84-97。
- 劉亮佑。2014。《自由的兩難：台東池上慣行與有機稻作的交織政治》。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文化碩士班，論文初稿，未出版。
- 劉華真。2011。〈消失的農漁民：重探臺灣早期環境抗爭〉，《臺灣社會學》第二十一期，頁1-49。
- 鄭正勇、林碧霞、黃淑德、吳東傑、馮小非。2009。〈保障小農的有機栽培權——對有機管理法令的修正意見〉。<http://goo.gl/ALRgjn>。（2014/06/06 瀏覽）
- 蕭阿勤。2005。〈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臺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臺灣社會學》第九期，頁1-56。
- 賴青松。2007。《青松&種田筆記：穀東俱樂部》。臺北：心靈工坊。
- 賴爾柔、戴君玲。2010。〈臺灣社群支持性農業的特性與困境〉，《台大農業推廣學報》第五十四期，頁41-52。
- 翟明磊。2016。〈稻穀成熟，將頭垂向大地——黃永松談《中國米食》背後的故事〉，收錄於《碧山09：米》，左靖主編，頁174-200。北京：中信。
- 臺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2015。《菜籃子革命：從共同購買到合作找幸福》。臺北：廣場。
- 開拓文教基金會。2016。〈臺灣農夫市集地圖〉。www.frontier.org.tw/blog/archives/2231（2013/04/30 瀏覽）
- 農委會。2016。〈農業統計資料查詢〉資料庫。<http://goo.gl/nbYUv5>（2015/12/14 瀏覽）

二、外文書目

- Abrahams, Caryn. 2007. "Globally useful conceptions of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in the Developing South: The Case of Johannesburg's Urban Food Supply System," in *Alternative Food Geographies*, edited by D. Maye, L. Holloway and M. Kneafsey. Amsterdam: Elsevier Ltd.
- Alkon, Alison H., and Julian Agyeman. ed. 2011. *Cultivating Food Justi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Allen, Patricia. 2008. "Mining for justice in the food system: perceptions, practices and possibilities," in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5: 157-161.
- Araghi, Farshad. 2003. "Food Regim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Value: 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0(2): 41-70.
- Barad, Karen. 2012. "Intra-actions: an interview with Karen Barad by Adam Kleinman," in *Mousse* 34: 76-81.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Dona. 2011. *Back to the Land: The Enduring Dream of Self-sufficiency in Modern Americ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Buller, Henry. 2000. "Re-creating rural territories: LEADER in France," in *Sociologia Ruralis* 40 (2): 190-199
- Cazzaniga, Nestor. 2006. "Pomacea canaliculata: Harmless and Useless in its Natural Realm (Argentina)," in *Global Advances in Ecology and Management of Golden Apple Snails*, edited by Ravindra Joshi and Leocadio Sebastian, pp.37-60. Muñoz: Philippine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 Choy, Tim. 2011. *Ecologies of Comparis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DuPuis, Melanie, and David Goodman. 2005. "Should We Go 'Home' to Eat?: Toward a Reflexive Politics of Localism," i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1(3): 359-371.
- DuPuis, Melanie, and Sean Gillon. 2009. "Alternative modes of governance: organic as civic engagement," in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6(1-2): 43-56.
- Friedmann, Harriet. 199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A Global Crisis," in *New Left Review* 197: 29-57.
- Goodman, David. 2004. "Rural Europe Redux? Reflections on 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s and Paradigm Change," in *Sociologia Ruralis* 44(1): 3-16.

- Gould, Rebecca. 2005. *At Home in Nature: Modern Homesteading and Spiritual Practice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ay, John. 2000.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he rural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Sociologia Ruralis* 40 (1): 30-52
- Green, Martin. 2000. "New Centres of Life." in *Beyond New Age: Exploring Alternative Spirituality*, edited by Steven Sutcliffe and Marion Bowman. pp. 51-64.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Guthman, Julie. 2004. *Agrarian Dreams: The Paradox of Organic Farming in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2011. "“If They Only Knew”": The Unbearable Whiteness of Alternative Food," in *Cultivating Food Justice*, edited by Alison Hope Alkon and Julian Agyeman. pp. 263-282.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Hanks, William and Carlo Severi. 2014. "Translating worlds: The epistemological space of translation," in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4 (2): 1-16
- Haraway, Donna. 1997.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Female_Man@_Meets_Oncomouse™: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 2015.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Plantationocene, Chthulucene: Making Kin," in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6: 159-165.
- Harvey, Davi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yes, K.A., R.C. Joshi, S.C. Thiengo, and R.H. Cowie. 2008. "Out of South America: Multiple Origins of Non-native Apple Snails in Asia."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s* 14: 701-712.
- Heller, Chaia. 2013. *Food, Farms and Solidarity: French farmers challenge industrial agriculture and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olt-Gimenez, Eric. 2011. "Food Security, Food Justice, or Food Sovereignty?: Crises, Food Movements, and Regime Change," in *Cultivating Food Justice*, edited by Alison Hope Alkon and Julian Agyeman. pp. 309-330.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Latour, Bruno. 2004.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in *Critical inquiry* 30(2): 225-48.
- . 2007. *Rassembling the soci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itch, Alison. 2003. "Slow Food and the Politics of Pork Fat: Italian Food and European Identity," in *Ethnos* Vol 68(4): 437-462.

- Liu, Lydia. 1995.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 Kuei-Mei, and Hsin-Hsing Chen. 2011. "Technological Momentum and the Hegemony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an Organic Rice Cooperative in Taiwan," in *EASTS* (2): 135-172.
- Lowe, P., H. Buller and N. Ward 2002. "Setting the next agenda? British and French approaches to the second pillar of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i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8(1): 1-17.
- Masco, Joseph. 2010. "Bad Weather : on Planetary Crisis," 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0(1): 7-40.
- Ong, Aihwa and Stephan Collier. 2005. *Global assemblages :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Paull, John. 2011. "Biodynamic Agriculture: The Journey From Koberwitz to the World (1924-1938)," in *Journal of Organic Systems* 6(1): 27-41.
- Pols, Jeanette. 2005. "Enacting appreciations: beyond the patient perspective," in *Health Care Analysis* 13: 203-221.
- Rodale Institute. 2015. *The Farming Systems Trial*. <http://rodaleinstitute.org/our-work/farming-systems-trial/>. (Accessed on 30 May 2016)
- Sastuka, Shiho. 2015. *Nature in Transl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hore, Cris. 2005. "All in the translation: Interpreting the EU constitution," in *Sites* 2 (2): 10-32.
- Star, Susan L.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3): 377-391.
- Tsai, Yen-ling, Isabelle Carbonell, Joelle Chevrier, and Anna Tsing, forthcoming. "Golden Snail Opera: The More-Than- Human Performance of Friendly Farming on Taiwan's Lanyang Plain,"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 Tsing, Anna L. 2015.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aymond. 198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ised ed. 19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Geoff. 2001. "From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and back again? Exploring the (un)changed natural and mental landscapes of European agriculture," 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6)1: 77-102
- Zukin, Sharon. 1995. *The Cultures of Cities*.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